

衛理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論文

伊拉斯謨的北方人文主義及
其對宗教改革早期神學取向的影響

The Northern Humanism of Erasmus and Its Influence
on Early Reformation Theology

指導教授：林烽銓 博士

研 究 生：陳玟穎

日 期：2026 年 6 月

衛理神學研究院

神學碩士

學位論文

伊拉斯謨的北方人文主義及

其對宗教改革早期神學取向的影響

經指導複審合格特此證明

指導教授（簽名）：_____

複審教授（簽名）：_____

衛理神學研究院院長（簽名）：_____

2026 年 5 月 日

衛理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論文提要

研究所別： 神學碩士班 歷史神學

論文名稱：

伊拉斯謨的北方人文主義及其對宗教改革早期神學取向的影響

The Northern Humanism of Erasmus and Its Influence on Early
Reformation Theology

指導教授：林烽銓 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共一冊，約 50000 字，分七章)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興起，並非單純源自教會制度的危機與神學爭議，也深受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潮的影響。其中，北方人文主義代表人物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在聖經研究、教會改革與基督徒敬虔生活上的倡議，對宗教改革初期神學方向產生深遠影響。雖然伊拉斯謨並未正式加入宗教改革陣營，甚至在部分議題上與馬丁·路德產生明顯分歧，但其所提倡之「回到原典」（ad fontes）、基督中心的人文教育，以及對教會道德更新的呼籲，皆為宗教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本研究旨在探討伊拉斯謨北方人文主義之核心精神，並分析其如何影響宗教改革早期的神學取向與教會更新。本文首先回顧北方人文主義之歷史背景與特色，說明其與義大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之差異，特別著重於敬虔、倫理與聖經研究的面向。其次，本文將探討伊拉斯謨的重要著作，包括《愚人頌》、《基督精兵手冊》以及希臘文《新約聖經》校訂本，分析其神學思想與改革理念。

此外，本文亦比較伊拉斯謨與宗教改革者，特別是路德，在自由意志、恩典、教會權威與信仰實踐等議題上的異同，藉此呈現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既合作又張

力並存的關係。研究指出，伊拉斯謨雖未成為改革宗神學家，但其對原典研究、教育改革與內在敬虔的重視，深刻影響了宗教改革初期的神學氛圍與知識方法。

本研究最後認為，伊拉斯謨的北方人文主義不僅是宗教改革的重要思想橋樑，也為當代教會提供一種結合學術、敬虔與教會更新的反思方向。其強調回歸聖經、培育信徒生命與追求理性對話的精神，至今仍具有神學與牧養上的重要意義。

關鍵字： 伊拉斯謨、北方人文主義、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路德、教會改革、敬虔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s shaped not only by ecclesiastical crises and theological controversies, but also by the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influence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Amo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Northern Humanism, Desiderius Erasmu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biblical scholarship, moral renewal, and Christian piety, all of which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religious and theological climate of the early Reformation. Although Erasmus never formally joined the Protestant movement and later came into theological conflict with Martin Luther, his emphasis on *ad fontes* (back to the sources), Christ-centered learning, and reform within the church provided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ation.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central characteristics of Erasmus's Northern Humanism and examines its influence on the the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ecclesiastical renewal of the early Reformation. The study firs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Humanism, distinguishing it from Italian Renaissance humanism, particularly in its stronger emphasis on biblical studies, ethical reform, and practical Christian piety. It then investigates Erasmus's theological thought and reform ideal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selected major writings and his biblical scholarship.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compares Erasmus with the Reformers, especially Martin Luther, on several key theological issues. Although Erasmus remained with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did not advocate separation from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his scholarly methods, educational ideals, and emphasis on inward faith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Reformation theology and church reform.

This study argues that Erasmus's Northern Humanism functioned as an important bridge toward the Reformation. His integration of scholarship, piety, and ecclesiastical renewal not only shaped the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of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but also continue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theological reflection,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pastoral ministry. The thesis therefore highlights Erasmus as both a critical humanist scholar and a transitional figure whose influence extended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into the broader history of Christian reform.

Keywords: Desiderius Erasmus, Northern Humanism, Reformation, Renaissance Humanism, Martin Luther, Church Reform, Christian Piety

致謝

回顧這段在衛理神學院的學習旅程，心中充滿感恩。這篇論文的完成，不僅代表一個學位階段的結束，也象徵自己在信仰與神學探索道路上的另一個開始。論文主題雖聚焦於北方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早期神學之間的關係，但在研究與撰寫的過程中，我所經歷的，並不只是歷史與思想的分析，更是一場對自身信仰的重新整理與反思。

當閱讀伊拉斯謨、人文主義者以及宗教改革者之間的張力與對話時，我也不斷思想：人在知識、理性與敬虔之間，究竟如何尋求平衡？神學研究的目的，是否不只是為了累積知識，更是為了使人更真實地回到上帝面前？這些問題伴隨著我走過論文寫作的日子，也讓我重新確認，神學不只是學術上的追求，更是生命中的回應與委身。感謝上帝，在有限與疲憊之中，仍然一步一步帶領我，使我在研究過程中重新得力，也更加堅定未來繼續在神學道路上學習與服事的心志。

特別感謝上帝，在教會服事中的保守與引導。許多時候，在牧養、講道、探訪與各樣服事之間，要兼顧論文寫作並不容易。然而，正是在這樣忙碌而真實的服事現場中，我更加體會神學與教會不能分離。教會的需要，使神學不流於空談；而神學的反思，也幫助我重新檢視服事的初心與方向。感謝主，在每一個看似艱難的時刻，仍賜下恩典與力量，使我能繼續前行。

在此，也特別感謝孫復華牧師長久以來的鼓勵與支持。在學習與服事的道路上，牧師始終以溫和而堅定的態度給予我許多提醒與扶持。無論是在神學思考、教會服事，或人生方向上的勉勵，都成為我持續努力的重要力量。這份陪伴與關心，不只是知識上的幫助，更是一種生命的榜樣與鼓舞。

此外，也感謝所有曾經關心、代禱與支持我的師長、同學、弟兄姐妹與家人。因著你們的陪伴，使我在疲憊與壓力中仍能繼續堅持。願這篇論文不只是個人學習的成果，更能成為自己未來服事與研究道路上的提醒：始終以謙卑的心尋求真理，以敬虔的生命回應上帝的呼召。

最後，將一切榮耀與感謝歸於上帝。願主繼續引導我未來的道路，使我在學習、研究與服事中，都能忠心行在祂的旨意裡。

玟穎 2026/June

m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2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定位.....	5
第四節 論文架構說明.....	5
第二章 北方人文主義的形成與核心精神	8
第一節 文藝復興背景與人文主義興起.....	8
第二節 人文學科的學習（studia humanitatis）的教育理想.....	9
第三節 回到源頭（ad fontes）.....	10
第四節 北方人文主義的宗教特色.....	11
第五節 伊拉斯謨作為北方人文主義代表.....	13
第六節 對中世紀神學文化的挑戰.....	14
第七節 結論.....	15
第三章 伊拉斯謨的人文主義神學	17
第一節 伊拉斯謨的生平與學術背景.....	17
第二節 回歸原典的神學意義.....	18
第三節 學者共和國、聖經詮釋、道德改革與教會批判.....	19
第四節 《愚人頌》中的教會批判與人文主義神學.....	20
第五節 伊拉斯謨神學的張力與限制.....	22
第六節 小結.....	23
第四章 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神學回應	26
第一節 從人文主義改革到福音性的突破.....	26
第二節 馬丁路德與人文主義.....	27
第三節 路德的神學突破：聖經觀、理性與恩典.....	29
第四節 「因信稱義」：宗教改革神學的核心突破.....	30
第五節 自由意志之爭.....	32
第六節 結論.....	34

第五章 人文主義與新教神學之間的承接與分歧	36
第一節 神學方法上的連續性：宗教改革並非憑空產生	37
第二節 對人性的理解：回應可能與意志受限	39
第三節 對救恩的理解：協力論與單方恩典之張力	41
第四節 教會更新路徑的不同想像：改革或斷裂	42
第五節 《致命的紛爭》（Fatal Discord）的深層啟示：張力的崩解	43
第六節 對當代教會與神學的意義	44
第七節 結論：分歧之後的可能性	45
第六章 神學反思與當代意義	47
第一節 基督新教對宗教改革傳統的承接與修正	47
第二節 恩典與責任：當代救恩論的再思	49
第三節 真理與合一：教會公共見證的挑戰	50
第四節 學術、敬虔與牧養的整合	51
第五節 今日教會的實踐建議	52
第六節 對華人教會處境的特別意義	54
第七節 結論：在張力中持守更新	55
第七章 結論	57
附錄一 訪談目的與訪談架構說明	62
附錄二：訪談題目設計與論述	64
附錄三：訪談人物及訪談日期	67
附錄四：訪談摘要	68
參考書目	79

第一章 緒論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被視為西方教會史的重要轉折點，所帶來的不僅是制度上的改變，更涉及神學方法、聖經權威、救恩理解與教會實踐的全面更新。然而，宗教改革並非憑空產生的歷史事件，而是在多重思想與文化力量交會下逐步形成。其中，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特別是北方人文主義，對宗教改革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核心精神，常以拉丁文 *ad fontes*（回到源頭）概括之。此精神強調返回古典文本與原始資料，重視語文能力、文本校勘、歷史理解與倫理教育。與中世紀後期偏重經院哲學邏輯推演的神學方法相比，人文主義者更重視文本本身、歷史脈絡與道德生命的更新。

然而，在一般教會敘事中，人文主義常被簡化理解為一種以人為中心、甚至導向世俗化的思潮；相對地，宗教改革則被描述為單純回歸聖經、反對中世紀教會腐敗的屬靈運動。這種二分式理解，容易忽略兩者之間實際存在的深層關聯。

若仔細觀察，早期宗教改革者如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與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在聖經原文研究、教育制度建立、釋經方法更新及神學語言精確化等方面，皆大量承接人文主義成果。尤其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c.1466-1536）所編訂之希臘文新約聖經《伊拉斯謨 1516 年新約聖經校訂本》（*Novum Instrumentum Omne*），更直接影響宗教改革時期的聖經研究與翻譯工作。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者雖借用人文主義方法，卻在核心神學議題上產生明顯的分歧。例如在人性狀態、自由意志、恩典的主動性，以及教會權威來源等議題上，

改革者最終與伊拉斯謨分道揚鑣。尤其路德與伊拉斯謨之間關於自由意志的論戰，更呈現二者在福音理解上的根本差異。

因此，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於：北方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究竟是延續關係、斷裂關係，抑或是一種兼具承接與張力的複雜互動？若僅將人文主義視為宗教改革的背景，可能低估其方法論貢獻；若將其視為改革神學前身，則可能忽略兩者在恩典論上的深刻差異。

本研究將以伊拉斯謨為核心人物，探討其思想如何影響路德與加爾文，並進一步分析宗教改革如何一方面承接北方人文主義成果，另一方面建立自身神學界線。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於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中葉之西歐思想史脈絡，時間上以伊拉斯謨、路德與加爾文活躍時期為主；地域上以尼德蘭、德意志地區、瑞士與法語改革圈為主要討論範圍。

主要探討北方人文主義對宗教改革之影響，並聚焦於其在思想方法與神學發展上的關鍵角色。首先，將從歷史脈絡出發，分析北方人文主義之形成背景與其核心精神。此部分特別關注人文學科的學習（*studia humanitatis*）的發展，包括文法、修辭、歷史與倫理等學科如何重新被重視，並成為知識與教育革新的基礎。同時，亦將探討語文學研究在文本校訂與經典重讀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對聖經原文的回歸如何促成神學反思。此外，本研究亦關注人文主義所蘊含的教育理想與道德改革訴求，說明其如何強調內在敬虔、品格塑造與社會更新，從而為宗教改革預備思想土壤。

本研究將深入分析伊拉斯謨的神學思想特色。作為北方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橫跨古典學術與基督教信仰，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本研究將特別探討其聖經觀，即其強調回歸原文、重視文本語境與倫理實踐的詮釋取向；在倫理觀方面，則分析其對內在虔誠的倡導，如何超越形式化宗教；在教會改革觀上，則關注其溫和改革

立場與對教會腐敗的批判；此外，亦將討論其自由意志論述，特別是其與路德之間的神學爭辯，藉此呈現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的張力與分歧。

本研究將探討宗教改革者如何承接並轉化人文主義的方法，特別是馬丁路德與加爾文在神學發展上的創新。兩者皆受人文主義語文學的影響，重視回歸聖經原文與歷史語境，但在核心教義上則進一步發展出與人文主義不同的神學立場。本研究將分析他們在恩典論、人論與權威論上的主張，例如「唯獨恩典」對人性能力的重新界定，以及「唯獨聖經」對教會權威的重構，從而說明宗教改革既承繼人文主義的方法論資源，同時也在神學深度上對其進行修正與超越。

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採取多重取徑，以確保對歷史與神學議題的全面理解。將運用歷史文本分析法，細讀伊拉斯謨、馬丁路德與加爾文之代表性著作，並將其置於各自的歷史處境中加以詮釋。此方法不僅關注內容本身，亦重視寫作目的及其所回應的具體歷史問題，藉此避免以當代觀點簡化其思想，並更準確掌握其原初意涵。

本研究採用比較神學研究法，透過橫向對照三位思想家在多個核心議題上的觀點差異與共通性。比較範圍涵蓋人性論、恩典論、聖經權威、教會改革以及教育理念等面向。透過此一方法，可以更清楚地呈現北方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既連續又斷裂的關係，並揭示不同神學立場背後的思想前提與方法論差異。

此外，本研究亦將進行系統性的文獻分析，整理近代學界關於「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關係」之主要研究成果與詮釋進路。透過回顧不同學者的觀點與爭論，建立清晰的對話脈絡，也能定位研究的貢獻與限制，並在既有研究基礎上提出更具整合性的理解。

因應當代教會處境與研究對象之轉變，本研究亦輔以質性訪談作為研究方法之一。隨著時代變遷，教會的形成、聚會模式與福音外展逐漸呈現多元化與網路化的趨勢，從傳統實體教會延伸至數位平台與網路社群，使當代教會的神學實踐與牧養樣態產生新的發展。因此，本文除採用傳統歷史文本與神學文獻研究外，亦透過訪談方

式，蒐集現今教會牧者與事奉者對神學教育、敬虔生活與牧養實踐之觀察與反思，以作為歷史研究與當代教會處境之間的對話。

「訪談」為質性研究中常見的方法之一，透過研究者（researcher）與資訊提供者（informant/interviewee）之間的對談，研究者得以獲取無法僅依文本分析所得之經驗性資料與實務觀察。依據目前學術研究之分類，訪談方式可分為非正式訪談、非結構訪談、半結構訪談與結構性訪談。¹本研究採取「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式，即研究者預先設計訪談問題與主題方向，但在實際訪談過程中，仍保留相當程度之開放性與彈性，使受訪者能依其經驗、背景與牧會處境自由回應，並透過對話深化研究主題之理解。

本研究之訪談設計，主要圍繞「學術、敬虔與牧養」三個面向，藉以探討當代教會如何理解神學教育與屬靈生命之整合問題。研究者亦盡可能維持訪談情境之自然與輕鬆，以提升受訪者回應之真實性與完整性。相關訪談操作方式，係參照謝大立〈口述歷史與教會史研究初探〉所提出之研究步驟進行。²

正如保羅·湯普遜（Paul R. Thompson）所指出：「整個訪談應被視為訪問者與受訪者共同生產的成果（joint product），是一種言談形式。」³因此，本研究亦重視訪談前之問題設計、訪談過程中的互動，以及訪談後之整理與詮釋。研究者將受訪者之回應置於其教會背景與當代處境中理解，藉此使歷史神學研究不僅停留於文本分析，也能與今日教會實況形成對話與反思。

上述歷史文本分析、比較神學研究、文獻分析與質性訪談等方法彼此互補，使本研究能在歷史脈絡、文本詮釋、當代教會處境與神學反思之間取得平衡，進而達成較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¹ 亞瑟·伯格（Arthur Asa Berger），《媒介與傳播研究方法》，黃光玉、劉念夏、陳清文譯（台北市：風雲論壇，2004）。

² 謝大立，《揚聲高唱咱的歌：口述歷史與教會史研究初探》（台北市：台灣神學院，2013），56-63。

³ 保羅·湯普遜，《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覃方明等譯（台北市：牛津，1999），228-9。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定位

關於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關係，學界大致可分三種路線。第一種觀點強調連續性，認為人文主義為宗教改革預備道路。此觀點指出，若無人文主義的語文復興、原典研究與教育改革，宗教改革難以形成。第二種觀點強調斷裂性，認為宗教改革核心在於因信稱義與恩典論，而此正超越甚至反對人文主義較樂觀的人性理解。第三種觀點則採綜合模式，認為二者在方法上連續，在神學核心上分歧。近年研究多傾向此立場。

然而，現有研究仍常出現兩種不足：過度聚焦路德與伊拉斯謨之自由意志論戰，而忽略更廣泛的方法論與教育層面；及對加爾文如何承接人文主義傳統之討論相對不足。因此，本文研究定位在於：不僅討論神學爭議本身，更從「方法、語言、神學界線」三層面，重新評估北方人文主義與早期新教神學之關係。

換言之，本文主張：北方人文主義既是宗教改革的重要橋樑，也是改革神學必須超越的界線。

第四節 論文架構說明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方法、文獻回顧與研究定位。第二章探討北方人文主義的歷史形成，分析文藝復興背景、人文學科的學習（*studia humanitatis*）與回到源頭（*ad fontes*）的精神。第三章聚焦伊拉斯謨思想，說明其神學特色、教會改革觀與限制。第四章探討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回應，分析路德如何承接並超越人文主義。第五章比較伊拉斯謨、路德與加爾文在恩典、人性與權威問題上的承接與分歧。第六章提出歷史神學反思與當代意義，思考學術、福音、制度與生命之整合。第七章總結全文，指出北方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關係，乃承接中的張力，而非單純對立。

鑰字

一、義大利人文主義（Italian Humanism）

義大利人文主義係指十四至十五世紀興起於義大利諸城邦之文化與思想運動，通常被視為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重要思想基礎。其核心精神在於回歸古典希臘羅馬文化傳統，透過重新研讀古典文獻，恢復語文修養、倫理思辨與公共生活的理想。人文主義者主張教育不應僅侷限於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抽象推理，而應重視文法、修辭、歷史、詩學與道德哲學等「人文學科的學習」（studia humanitatis），藉此培養具德性與判斷力的公民。⁴

義大利人文主義最早發展於弗羅倫斯（Florence）、威尼斯（Venice）等城市，其代表人物包括法蘭切斯科·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h）、李奧納度·布倫尼（Leonardo Bruni）與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等人。其中洛倫佐·瓦拉以通過文獻考證《君士坦丁贈與書》（Donatio Constantini）揭露此文為虛構，顯示人文主義對文本考證與歷史意識的重視。⁵

整體而言，義大利人文主義雖不必然反宗教，但其關懷焦點多集中於古典文化復興、教育革新與公共倫理建構，宗教改革議題尚非其主要核心。

二、北方基督教人文主義（Northern Christian Humanism）

北方基督教人文主義係指十五至十六世紀發展於阿爾卑斯山以北之人文主義思潮，主要分布於尼德蘭、德意志、法蘭西與英格蘭等地區。此思潮承接義大利人文主義之語文學方法與古典研究精神，但其目的更明確地指向基督信仰的更新、教會改革與道德復興，因此具有鮮明的宗教性格。⁶

⁴ Paul Oskar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the Classic, 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3–17.

⁵ 雅各·布各哈克（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花亦芬譯（新北市：聯經出版社，2007），85–102。

⁶ 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宗教改革運動思潮》（*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蔡錦圖、陳佐人譯（香港：基道出版社，2006），55–63。

北方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主張回歸聖經與早期教父著作，強調以原文研究（希臘文、希伯來文、拉丁文）重新理解基督教信仰。他們批判晚期中世紀教會在制度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腐敗、形式主義與迷信傾向，提倡內在敬虔、倫理更新與教育改革。

其代表人物包括伊拉斯謨、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約翰內斯·羅伊希林（Johann Reuchlin, 1455-1522）等。其中伊拉斯謨尤具代表性，其出版之《伊拉斯謨 1516 年新約聖經校訂本》（*Novum Instrumentum Omne*）透過希臘文新約與拉丁文對照文本，促進聖經研究革新，也對後續宗教改革產生深遠影響。因此，北方基督教人文主義可視為連結文藝復興學術方法與宗教改革關懷的重要橋樑。⁷

三、本文之使用定義與研究定位

本文所使用之「人文主義」一詞，並非泛指近代以人為中心之世俗思想，亦非現代人本主義，而是特指十五至十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脈絡下，以古典學術方法促進教育、倫理與宗教更新之歷史運動。

就本文研究主題而言，所關注者主要為以伊拉斯謨為代表之「北方基督教人文主義」。此一傳統結合語文學、文本批判與敬虔改革精神，對十六世紀教會更新與宗教改革前期思想發展具有關鍵影響，亦為理解伊拉斯謨神學立場與歷史角色之重要背景。

⁷ 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伊拉斯謨傳：伊拉斯謨與宗教改革》（*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何道寬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23-41。

第二章 北方人文主義的形成與核心精神

本章目的，說明北方人文主義的歷史形成背景、思想核心與對中世紀晚期神學文化所帶來的挑戰，並指出其如何為宗教改革預備方法論基礎。其中，伊拉斯謨乃此一運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節 文藝復興背景與人文主義興起

若要理解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爆發與早期新教神學的形成，僅從教會制度腐敗、贖罪券爭議或政治權力角度切入，仍不足以充分說明其思想根源。宗教改革並非突發性的斷裂事件，而是於十五世紀以來歐洲整體文化轉型的長期累積，其背後涉及教育制度的變遷、知識權威的重估，以及文本理解方式的根本轉向。在此歷史進程中，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所帶來的語文復興與學術方法更新，構成宗教改革不可忽視的前提條件。⁸

人文主義的興起，與古典文化的再發現密切相關。隨著拜占庭帝國晚期學者向西歐遷移，大量希臘文手稿得以重新進入西歐知識界；再加上印刷術的發明，使文本得以快速複製與流通，學術研究逐漸從少數修道院與學院的壟斷中擴展出來。在此背景下，學者開始質疑長期依賴的中世紀拉丁詮釋傳統，轉而主張直接閱讀古典原典，強調語言精確性與歷史語境的重要性。這不僅是一種知識來源的轉變，更是一種認識論上的轉向，即從「依賴權威」走向「回歸文本」。⁹

此外，人文主義的興起亦反映出對晚期經院哲學的不滿。經院神學長期以來透過亞里斯多德邏輯架構建構嚴密的神學體系，雖然在理性論證上達到高度精緻，卻逐漸流於形式化與技術化，與實際信仰生活及牧養需求產生距離。面對此種情況，人文

⁸ 林鴻信，《基督宗教思想史（中）》（台北：禮記，2010），45-52。

⁹ 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歷史神學》（*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趙崇明譯（香港：天道書樓，2020），76-79。

主義者認為，若神學無法回應人的道德生命與社會處境，則其價值將受到質疑。因此，他們轉而強調語言、歷史與倫理的整合，主張透過文本閱讀與道德培養，使知識重新與生命實踐連結。

然而，人文主義並非單一、一致的運動。義大利城市所發展的人文主義，多著重於古典修辭、歷史書寫與公民德性，其關懷核心在於培養能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治人物；相對而言，北方地區（特別是尼德蘭、德意志與英格蘭）的人文主義，則更直接面對教會與信仰問題，將人文學術方法應用於聖經研究與宗教改革之中。這種差異，使人文主義在北方逐漸呈現出更鮮明的宗教性格，也為後來宗教改革的神學發展預備了重要方向。

第二節 人文學科的學習（*studia humanitatis*）的教育理想

所謂「人文學科的學習」，乃是人文主義教育體系的核心概念，內容涵蓋文法、修辭、詩學、歷史與道德哲學等學科。此一教育模式並非單純知識分類，而是一套關於「如何形塑人」的整體構想，其目標在於培養能夠清晰思考、適切表達並具備道德判斷力的個體。與中世紀大學偏重邏輯辯證與神學體系建構不同，人文主義教育更強調語言能力與歷史意識，並將倫理實踐視為學習的最終目的。¹⁰

在此教育理想中，「人」被理解為可透過學習而被塑造的存在。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思想形成的媒介；歷史不只是過去事件的記錄，而是道德反思與判斷的資源；而道德哲學則不僅停留於抽象原則，而是具體指向生活中的德性實踐。因此，「人文學科的學習」所培養的，不是專門技術人才，而是一種具有公共責任感與道德自覺的整全人格。

當此一教育理念傳入北方地區後，性質產生了關鍵性的轉化。北方人文主義者並未放棄古典學術傳統，反而在基礎上進一步賦予基督教意義，使人文教育不再僅服

¹⁰ Paul Oskar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the Classic, 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22-28.

務於政治與公民生活，而是成為教會更新的重要工具。¹¹語言訓練被視為正確理解聖經的必要條件，歷史研究則有助於辨識教會傳統的發展與變化，道德哲學則被重新詮釋為效法基督生命的途徑。如此一來，古典德性與基督教敬虔逐漸融合，形成一種兼具知識與信仰的教育理想。

這種轉化亦對歐洲教育制度產生深遠影響。中世紀早期的學習機構，多由修道院與主教座堂學校發展而來，其主要目的在於培養神職人員。然而，隨著人文主義的發展，教育的功能逐漸從單一的神職訓練，擴展為更廣泛的知識傳授與人格培養。以波隆那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為例，作為歐洲最早形成的大學之一，其制度逐步從教會體系中獨立出來，並發展出同時涵蓋神學、法律與人文學科的教學結構。大學不再僅是宗教機構的延伸，而逐漸成為知識生產與傳播的核心場所。

在此發展過程中，人文主義教育提供了一種新的學術取向，使語文學與歷史研究成為學術訓練的重要基礎，並間接影響後來宗教改革者對教育與聖經研究的高度重視。可以說，北方人文主義不僅承接了「人文學科的學習」的教育理想，更將其轉化為教會更新與神學反思的重要途徑。

第三節 回到源頭（ad fontes）

「回到源頭」（ad fontes）乃是人文主義最具代表性的核心精神之一，所指的不僅是一種學術口號，更是一種關於知識權威與理解方法的根本轉向。在中世紀後期的學術傳統中，知識多透過層層註解與權威詮釋而被傳遞，原始文本往往被包覆於龐大的詮釋體系之中。然而，人文主義者逐漸意識到，若缺乏對原典的直接閱讀，則無法確保理解的準確性，甚至可能在長期傳承中產生偏差。因此，他們主張繞過後期註解，直接回到最初的文本來源，藉此重建知識的基礎。

此一取向首先在於對古典文獻的重新閱讀。透過接觸希臘與羅馬作家的原始作品，學者不僅重新學習語言與修辭，更重新思考政治、倫理與人性的基本問題。這種

¹¹ 林鴻信，《系統神學（上）》（新北：校園書房，2017），112-118。

閱讀方式強調語境、文體與歷史背景，使文本不再只是權威語句的集合，而是具有內在邏輯與思想脈絡的整體。由此產生的，不僅是知識內容的更新，更是理解方式的轉變，即從抽象命題的推論，轉向具體文本的詮釋。

然而，「回到源頭」在北方人文主義的脈絡中，進一步被賦予鮮明的神學意涵。當學者將此方法應用於基督教信仰時，「源頭」便不再僅指古典文學，而更指向聖經原文與早期教會傳統。這意味著，信仰的根基應建立在希伯來文舊約與希臘文新約之上，而非完全依賴中世紀神學體系的詮釋。透過語文學方法對聖經進行重新校訂與翻譯，學者得以更貼近經文本身的語意與歷史處境，進而對既有教會教導提出檢視。¹²

在此過程中，早期教父的著作亦重新受到重視。這些文本被視為接近使徒時代的見證，能提供理解基督教原始信仰的重要線索。當聖經與教父文獻被重新置於研究中心時，許多中世紀晚期形成的教會制度與神學觀點，便開始接受歷史與文本的雙重檢驗。此一發展雖未立即導致制度性變革，卻已在思想層面上動搖既有權威的穩固性。

因此，「回到源頭」不僅是一種學術方法，更是一種具有改革潛能的思想運動。當信仰被重新連結於原始文本與歷史脈絡時，教會傳統便不再被視為不可質疑的終極權威，而必須接受持續的反思與修正。此一方法論上的轉向，正是後來宗教改革能夠展開的重要前提之一。¹³

第四節 北方人文主義的宗教特色

相較於義大利人文主義主要關注古典文化的復興與公民德性的培養，北方人文主義則呈現出更為鮮明的宗教取向。此一差異並非偶然，而是與北歐地區的教會處境密切相關。在尼德蘭、德意志與英格蘭等地，教會制度的僵化、神職人員教育不足，

¹² Alister E. McGrath, *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John Wiley, 2021), 52-60.

¹³ McGrath, *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61-72.

以及信仰生活流於形式的現象，使得知識份子在接觸人文主義方法之後，自然將其應用於宗教反思之中。換言之，人文學術在北方並未停留於文化層面，而是迅速進入教會與信仰生活的核心。

在此背景下，北方人文主義逐漸形成一種以內在敬虔為中心的信仰理解。相對於外在禮儀與制度性的宗教實踐，人文主義者更強調個人內心的悔改與生命更新，認為真正的信仰應表現在品格與行動之中，而非僅止於儀式參與。這種取向並非否定教會傳統，而是試圖糾正其流於形式的傾向，使信仰重新回到福音所強調的生命轉化。¹⁴ 此外，北方人文主義亦高度重視聖經在信仰生活中的地位。由於語文學與文本研究的發展，學者逐漸意識到，若信徒無法直接接觸聖經內容，則信仰容易被中介權威所壟斷。因此，推動聖經閱讀與理解，成為此一運動的重要方向。這不僅涉及翻譯與出版工作，也牽涉到教育層面的改革，使更多人具備閱讀與理解經文的能力。

與此同時，人文主義者亦對神職人員的培養提出反思。他們認為，教士不應僅具備制度性職分，更應在語文能力、道德品格與牧養實踐上有所預備。若缺乏適當教育，神職人員不僅難以正確詮釋聖經，也無法有效引導信徒生命。因此，教育改革與教會更新在此緊密結合，形成一種以知識與德性並重的改革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北方人文主義者並未意圖與既有教會體制決裂。他們的關懷主要在於更新，而非分裂，期望透過教育、文本研究與道德呼籲，使教會從內部得以改革。這種相對溫和的立場，使其與後來宗教改革運動之間既具有連續性，也存在明顯張力，並為後續神學發展留下重要空間。

正是在這樣一種介於傳統維護與改革呼聲之間的思想處境中，北方人文主義並未停留於抽象理念，而是透過具體人物的著作與行動得以展現。其中，最能綜合此一

¹⁴ 伊拉斯謨 (Erasmus D.)，〈論基督君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Christian Prince*)，李康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03)，33-37。

運動精神並產生廣泛影響者，即為伊拉斯謨。因此，若要進一步理解北方人文主義如何在歷史中發揮實質作用，便有必要轉向對其代表人物的考察。

第五節 伊拉斯謨作為北方人文主義代表

在北方人文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伊拉斯謨無疑是最具代表性且影響最深遠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與著作，不僅綜合了人文學術的語文方法與基督教信仰關懷，也在歐洲知識界形成廣泛影響，成為連結中世紀與宗教改革時代的重要橋樑。

伊拉斯謨的神學取向，核心可概括為其所倡導的「基督哲學」(philosophia Christi)。在他看來，基督信仰的本質並不在於繁複的神學辯證或制度性規範，而在於效法基督的生命，實踐愛與謙卑的德性。¹⁵這種理解使他對當時盛行的經院神學產生批判，認為過度抽象的理論討論往往忽略了信仰的實踐面向，無法真正更新教會與信徒生命。

在聖經觀方面，伊拉斯謨強調回歸原文的重要性，主張透過語文學方法直接研讀經文，以避免長期傳承中可能產生的誤解。他於 1516 年出版的希臘文新約聖經及其拉丁文修訂本《伊拉斯謨 1516 年新約聖經校訂本》(Novum Instrumentum Omne)，聖經研究進入新的階段，也為後來的宗教改革者提供了重要文本基礎。透過此一工作，聖經逐漸從傳統詮釋體系中被釋放出來，重新成為神學反思的中心。¹⁶

然而，在教會改革問題上，伊拉斯謨採取相對謹慎的立場。他雖對教會弊端提出尖銳批評，卻避免激進行動或公開對抗制度權威，期望透過教育與道德更新逐步改善教會現況。這種態度使他在後來宗教改革運動興起時，既與改革者共享某些關懷，又無法完全認同其激烈作法，形成一種介於傳統與改革之間的張力位置。

¹⁵ Dolan, John P., ed. *The Essential Erasmus* (New York: Nal Penguin, 1893), 95-102.

¹⁶ 約翰·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伊拉斯謨傳：伊拉斯謨與宗教改革》(*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何道寬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8），101-110。

此外，伊拉斯謨始終相信教育在社會與教會更新中的關鍵角色。他認為，唯有透過培養具備語文能力、道德判斷與信仰深度的基督徒，才能真正改變教會與社會。因此，其著作不僅具有學術性，也具有明確的教育目的，試圖形塑一種兼具理性與敬虔的基督徒人格。

綜合而言，伊拉斯謨並非單純的學者或神學家，而是一位跨越時代轉折的人物。他既承繼中世紀基督教傳統，又開啟新的學術方法與信仰理解，其思想所呈現的張力，正反映出北方人文主義在歷史轉型中的關鍵地位。若僅從個別人物的思想加以理解，仍不足以完整掌握北方人文主義的歷史意義。更進一步的問題在於：此一運動究竟在整體層面上對中世紀神學文化造成何種影響？換言之，伊拉斯謨所體現的，不僅是個人的學術立場，更是一種神學方法、權威結構與信仰實踐的全面挑戰。為釐清此一層面的意義，有必要進一步從整體角度加以分析。

第六節 對中世紀神學文化的挑戰

北方人文主義的興起，並非僅是學術風格的改變，而是對整個中世紀神學文化提出深層挑戰。這種挑戰首先體現在方法論的轉向上。傳統經院神學以邏輯推演與命題分析為主要工具，強調在既有權威架構內進行理性論證；相對而言，人文主義則強調語文學與歷史方法，主張透過回歸原始文本與語境理解，重新檢視神學命題的基礎。此一轉變，使神學不再僅依賴抽象推理，而逐漸回到具體文本與歷史脈絡之中。

隨著方法的改變，權威觀念亦受到重新評估。當學者能夠直接閱讀聖經原文及早期教父著作時，中世紀晚期所形成的神學體系與教會傳統，便不再被視為不可質疑的終極依據，而必須接受文本與歷史的檢驗。這並不意味著完全否定傳統，而是將其置於一個可以被重新理解與修正的位置，從而動搖長期以來穩固的權威結構。

更進一步而言，人文主義對教會生活的道德面向亦提出批判。當信仰被制度化並過度依賴外在形式時，內在生命的更新往往被忽略。北方人文主義者透過其著作與

教育實踐，持續提醒教會，真正的基督信仰應表現在品格、行為與對他人的關懷之中，而非僅止於儀式遵行或教義認同。此種強調內在與外在一致的信仰觀，對當時普遍存在的宗教形式主義構成重要挑戰。¹⁷

儘管上述的挑戰在當時並未立即導致制度性的分裂，卻逐步削弱了中世紀神學體系的整體穩定性。當方法、權威與信仰實踐同時受到檢視時，既有秩序已難以維持其原有的自明性。正是在此種思想與文化逐漸鬆動的情況下，宗教改革得以在十六世紀初迅速展開，並發展出更為明確的神學立場與制度變革。

因此，可以看出，北方人文主義雖未直接引發宗教改革，卻在方法論與問題意識上為其鋪設了關鍵基礎。它一方面保留對教會合一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在知識與信仰層面引入持續反思的動力。正是在這種既延續又轉變的張力之中，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得以理解其自身的歷史位置。

第七節 結論

綜合本章之分析，可以看出北方人文主義並非單純的文化復興運動，而是一場深刻影響神學思考與教會生活的知識轉型。其歷史意義不僅在於承接文藝復興對古典文化的重估，更在於將語文學、歷史意識與教育理想引入基督教思想之中，使信仰不再僅依附於既有權威體系，而逐漸回到文本、語境與生命實踐的整理解釋。

在教育層面上，「人文學科的學習」所代表的人文學科訓練，重新界定了知識與人格之間的關係。學習不再僅以理論建構為目標，而是指向語言能力、歷史理解與道德塑造的整全發展。當這教育理想進入北方基督教世界後，進一步轉化為教會更新的重要資源，使語文訓練服務於聖經詮釋，歷史研究有助於辨識傳統發展，而倫理反思

¹⁷ 林鴻信，《基督宗教思想史（中）》，58-64。

則導向基督徒生命的實踐。由此可見，人文主義不僅改變了學術內容，更重塑了神學形成的方式。

在方法論層面上，「回到源頭」(ad fontes)的原則，使聖經原文與早期教會傳統重新成為信仰反思的核心依據。透過語文學與歷史方法的運用，學者得以直接面對經文與古代文本，而不再完全依賴中世紀後期的詮釋體系。此一轉向不僅提升了文本理解的精確性，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權威的基礎，使教會傳統必須接受持續的檢驗與反思。

在宗教實踐與教會觀上，北方人文主義強調內在敬虔、道德更新與教育改革，對晚期中世紀教會的形式主義與制度化傾向提出溫和卻深刻的批判。雖然多數人文主義者並未主張教會分裂，而是期望透過內部更新帶來改變，但其所引入的方法與問題意識，已逐漸動搖既有體系的穩固性，並為後來更激進的改革提供了思想條件。

在此發展脈絡中，伊拉斯謨作為北方人文主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思想與實踐集中展現了此一運動的核心特質。他一方面透過語文學工作推動聖經研究的更新，另一方面又以「基督哲學」強調信仰的內在性與倫理實踐，使人文學術與基督教敬虔得以結合。然而，他溫和改革立場亦顯示，人文主義雖能提出批判與方向，卻在面對罪、人性與救恩確據等更深層神學問題時，仍未形成決定性的突破。

因此，可以說北方人文主義在歷史中的角色，乃是一種「預備性」的力量。它在方法上提供工具，在思想上提出問題，在教育上培養條件，卻未能完成神學上的重構。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者得以承接其成果，同時對其加以修正與深化，進而發展出更為明確的教義立場與信仰理解。¹⁸ 基於上述觀察，下一章將進一步聚焦於伊拉斯謨的人文主義，探討其在聖經觀、倫理觀與自由意志論述上的具體主張，並分析其思想在北方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所扮演的關鍵中介角色，呈現人文主義如何在歷史轉折中影響神學發展。

¹⁸ Alister E. McGrath, *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John Wiley, 2021), 61-72.

第三章 伊拉斯謨的人文主義神學

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c.1466–1536）被視為北方人文主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也是十六世紀初歐洲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他出生於尼德蘭鹿特丹（Rotterdam），成長於晚期中世紀教會制度與新興人文主義交會之際。父母早逝，使他自幼經歷生活的不安與依附處境，也培養出對制度權威的敏銳觀察。

第一節 伊拉斯謨的生平與學術背景

伊拉斯謨早年接受修道院教育，後進入奧斯定會修道院（Augustinian Canons）生活。這段經歷使他熟悉教會制度、拉丁文教育與神職體系，同時也使他親身感受到修道體制中的僵化、形式主義與學術貧乏。這些經驗日後深刻影響他對教會改革的態度，他並非反對教會本身，而是反對失去生命力與真誠敬虔的宗教制度。¹⁹

1495 年後，伊拉斯謨前往巴黎求學與講學。巴黎雖為當時歐洲重要學術中心，生活條件卻相當艱困。他長期受經濟拮据、疾病纏身與居所不穩所苦，經常仰賴贊助者接濟，才能維持研究與寫作工作。這種不穩定的生存經驗，使他一方面渴望學術自由，另一方面也養成在宗教與政治衝突中保持審慎與平衡的性格。

其後他多次旅居英格蘭、巴塞爾與義大利等地等地。尤其在英格蘭期間，他結識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約翰·柯立特（John Colet, 1467-1519）等學者，受到深刻啟發。²⁰這些友誼使他更加確信：古典學問、教育改革與基督信仰並非彼此衝突，而能共同促進社會更新。晚年伊拉斯謨長居巴塞爾，與著名出版商約

¹⁹ 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著，《宗教改革運動思潮》（*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蔡錦圖、陳佐人譯（香港：基道出版社，2006），45–48。

²⁰ 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著，《伊拉斯謨傳：伊拉斯謨與宗教改革》（*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何道寬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72–80。

翰·弗羅本（Johann Froben 1460-1527）合作，透過印刷術將其著作傳遍歐洲，使他成為第一代真正具有跨國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²¹

與中世紀經院神學家不同，伊拉斯謨並非以建立嚴密神學體系為志業。他更關心的是：如何藉由教育、語文研究與道德更新，使基督教信仰重新回到福音原初的純正樣貌。因此，他的思想既具有學術性，也帶有強烈的教會改革關懷。

伊拉斯謨所處的時代，正值教廷財政問題、神職腐敗、信仰形式化，以及民間渴望宗教更新之際。多數知識分子仍盼望透過教會內部改革，而非制度分裂來解決危機。伊拉斯謨正代表這種改革期待，既批判教會弊病，又不願走向分裂。

因此，若要理解宗教改革前夕的歐洲思想，伊拉斯謨是一位無法忽略的人物。他既承繼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精神，也為後來宗教改革者提供方法論資源與批判語言。

第二節 回歸原典的神學意義

伊拉斯謨於 1516 年出版之《伊拉斯謨 1516 年新約聖經校訂本》（*Novum Instrumentum Omne*），不僅是一項語文學成就，更是西方神學方法的重要轉向。長期以來，拉丁文武加大譯本作為西方教會的權威文本，在神學與講道中幾乎未受質疑。然而，隨著文本傳抄過程中的差異累積，以及對原文理解的限制，權威性逐漸成為人文主義者的反思。²²伊拉斯謨透過對希臘文原文的校訂與重新翻譯，使學界開始意識到，聖經理解並非單一傳統所能壟斷，是必須不斷回到文本本身加以檢驗。

這轉變對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者產生深遠影響。馬丁路德在其《羅馬書》註釋講義及後來的德文聖經翻譯工作中，正是建立在對原文的重新閱讀之上，使「因信稱

²¹ Kristeller, Paul Oskar, *Renaissance Thought: the Classic, 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18–25.

²² Olin, John C., ed., *Christian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Erasmu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97–103.

義」的理解得以從文本脈絡中被重新闡明。同樣地，加爾文在聖經註釋與講道中，也展現出對經文語境與文法結構的高度重視，力求使詮釋回到經文本身，而非依附既有傳統框架。²³可以說，伊拉斯謨所推動的語文學方法，成為改革者詮釋聖經的重要工具，使神學論述建立在更為嚴謹的文本基礎之上。

此外，印刷術的發展亦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隨著文本得以大量複製與流通，聖經不再侷限於神職人員的專屬資源，而逐漸進入一般信徒的生活之中。路德的德文聖經翻譯，使平信徒能直接閱讀經文，減少對拉丁文詮釋與神父講解的依賴。²⁴這不僅是語言轉換的問題，更涉及宗教權威的重新分配，當信徒能直接接觸聖經時，信仰理解的主動性亦隨之提升。

因此，「回到源頭」在伊拉斯謨的實踐中，不僅是一種學術方法，更逐漸演變為一種具有改革潛力的神學取向。它在不直接對抗教會制度的情況下，已悄然改變神學研究的基礎，使聖經文本重新成為信仰與教義的核心依據。這種方法論的轉變，最終在宗教改革中被進一步發展，並成為「唯獨聖經」原則的重要前提。

第三節 學者共和國、聖經詮釋、道德改革與教會批判

十五至十六世紀之交，隨著印刷術的普及、大學制度的擴展與城市文化的發展，歐洲逐漸形成一個跨越地域與政治疆界的知識交流網絡，後世稱之為「學者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此一共同體並非制度化的組織，而是由學者、神職人員與出版者透過書信往返、著作流通與學術辯論所構成，其運作基礎在於拉丁文作為共同語言，以及對知識共享與理性討論的重視。²⁵

²³ 麥格夫，《歷史神學》（*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趙崇明譯（香港：天道書樓，2020），151–156。

²⁴ 陶理主編，《基督教二千年史》（*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李伯明、林牧野譯（香港：海天書樓，2004），412–418。

²⁵ Huizinga, Johan, *Men and Ideas: History, the Middle Age, the Renaiss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1–214.

在此網絡中，伊拉斯謨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他廣泛的通信關係，成為連結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與義大利知識圈的重要節點，也使人文主義方法得以迅速擴散。透過這樣的交流機制，原本可能侷限於地方的教會問題，被提升為跨區域的公共議題，促進了對教會現況的集體反思。

從神學角度觀察，「學者共和國」對聖經詮釋產生深遠影響。它促進原文研究與教父文獻的整理，使文本得以在更廣泛的學術社群中被檢驗與討論。也使詮釋不再侷限於單一權威，而成為一種公開且可辯論的過程。它提升了知識分子在宗教議題中的參與，使神學不再只是教會內部事務，而成為公共理性的一部分。透過這樣的互動，逐漸形成一種超越教廷權威的學術空間，為後來宗教改革提供重要的思想平台。

在此背景下，伊拉斯謨的神學關懷呈現出鮮明的實踐取向。他並不著力於建立嚴密教義體系，而是透過著作與教育呼籲信徒回歸內在敬虔。他在《基督精兵手冊》（*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中強調靈性操練與德性培養，²⁶在《愚人頌》（*The Praise of Folly*）中揭露教會與社會的虛偽與腐敗，在《基督徒君王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中則探討政治倫理與基督信仰的關係。這些作品雖形式各異，卻共同指向一個核心關懷：信仰必須在個人生命與公共生活中具體實踐。

第四節 《愚人頌》中的教會批判與人文主義神學²⁷

在伊拉斯謨眾多著作之中，《愚人頌》（*The Praise of Folly*，1509年寫成，1511年出版）無疑是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一部作品。此書承襲古典修辭學中的擬人化傳統，讓「愚人」以第一人稱發言，透過誇張、反諷與幽默的方式，揭露當代歐洲社會與教會的荒謬現象。表面上，此書似乎是對愚昧的讚頌，實際上，它是一部尖銳的文化批判與改革呼籲文本。

²⁶ Dolan, John P., ed., *The Essential Erasmus* (New York: Nal Penguin, 1983), 180–192.

²⁷ 本節部分外文文獻之翻譯與摘要整理過程，使用 Google 翻譯及人工智慧工具作為輔助，相關內容已由作者進一步校訂與整合。

《愚人頌》的重要性，在於它使伊拉斯謨的人文主義思想，以通俗且富感染力的形式進入公共領域。相較於學術論文或神學辯論，《愚人頌》更容易被廣泛閱讀，因此其影響力遠超一般學術著作。透過文學形式，伊拉斯謨成功將改革意識帶入教會與社會討論之中。

《愚人頌》對教會領袖的批判相當鮮明。伊拉斯謨指出，部分主教與高階神職人員熱衷權位、財富與禮儀排場，卻忽略牧養群羊與教導真理的責任。這種現象反映晚期中世紀教會逐漸制度化與世俗化，屬靈職分被行政權力與社會地位所取代。伊拉斯謨並未否定教會職分本身，而是指出，當教會職分脫離福音使命時，其外在榮耀反成為內在空洞的遮掩。²⁸

伊拉斯謨亦批判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宗教。他諷刺某些信徒將朝聖、守齋、敬禮聖物或背誦禱詞視為得救保證，卻忽略悔改、愛人與敬虔生活的重要。這種批判反映其神學核心，真正的基督教不在外在儀式的累積，而在內在生命的更新。這一點與其《基督精兵手冊》所強調的內在敬虔精神一致，也預示後來宗教改革對「真信心」的重視。²⁹

《愚人頌》亦呈現伊拉斯謨對學術文化的反省。他批評某些經院學者沉迷繁複辯證、語詞爭論與抽象推理，卻忽略聖經信息與實際德行。這並非反智立場，而是反對知識與生命分裂。對伊拉斯謨而言，真正的學問應引導人更認識基督、更活出智慧，而非成為驕傲與競爭的工具。此種觀點正是人文主義教育理想的展現，即知識必須服務人格培育與公共善。³⁰

值得注意的是，《愚人頌》雖措辭尖銳，卻未走向革命式否定。伊拉斯謨批判教會弊病，並非要摧毀教會，而是期盼教會被醫治與更新。他相信透過教育、閱讀聖

²⁸ Adams, Robert M., ed., *The Praise of Folly and Other Writings: Desiderius Erasmu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9), 3–15.

²⁹ 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49–52。

³⁰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90–101.

經、恢復道德生活與回歸基督榜樣，教會仍有改革可能。此種立場使他與後來主張制度性決裂的宗教改革者有所不同，也顯示其溫和改革者的特質。

從神學歷史角度而言，《愚人頌》可被視為宗教改革前夕的重要先聲。它雖未提出因信稱義或唯獨聖經等教義命題，卻已深刻揭露教會腐敗、形式主義與神學空洞等問題。換言之，伊拉斯謨提出了改革的問題，而後來的改革者則進一步提出改革的答案。

綜上所述，《愚人頌》不僅是一部文學諷刺作品，更是一部承載人文主義神學關懷的改革文本。此書展現伊拉斯謨如何運用古典修辭、道德批判與基督教信仰理想，推動教會反省與更新，也證明北方人文主義並非純粹世俗文化運動，而是深刻參與了十六世紀初期神學轉型的歷史進程。

第五節 伊拉斯謨神學的張力與限制³¹

儘管伊拉斯謨對教會更新與神學方法轉型具有深遠貢獻，其思想本身亦呈現出明顯的張力與限制，這些特質在宗教改革爆發後尤為顯著。其神學關懷主要集中於道德更新與內在敬虔，強調人應回應上帝的呼召，透過教育與靈性操練逐步塑造生命。然而，在罪與恩典的根本問題上，他並未發展出系統性的教義反思，亦未對人類墮落狀態提出徹底的神學分析。

此一限制在其與馬丁路德的論辯中表露無遺。伊拉斯謨主張人仍保有某種自由意志，能在恩典的幫助下作出回應。相對而言，路德則強調人在罪中的完全無能，唯有上帝主動的恩典才能帶來拯救。這不僅是對自由意志的不同理解，更涉及對人性本

³¹ 本節部分外文文獻之翻譯與摘要整理過程，使用 Google 翻譯及人工智慧工具作為輔助，相關內容已由作者進一步校訂與整合。

質與救恩途徑的根本分歧。相較之下，伊拉斯謨的立場顯得較為溫和與人本，而宗教改革者則朝向更強調神主權的方向發展。³²

此外，伊拉斯謨在面對教會制度問題時，亦傾向採取審慎與中道的態度。他對教會弊端提出批判，卻不願支持制度性分裂，期望透過教育與道德復興達成改革。然而，當教會危機已涉及結構性與教義層面時，單靠倫理呼籲顯然不足以帶來根本轉變。這使他在宗教改革關鍵時刻顯得猶疑不決，也逐漸失去在運動中的主導地位。³³

儘管如此，若僅以未能成為改革領袖而評價伊拉斯謨，則未免失之偏頗。事實上，宗教改革者之所以能迅速推動神學突破，正是因為他已在思想層面鬆動了中世紀晚期的框架。他透過語文學方法使聖經重新被閱讀，透過教育理念使信仰與理性重新結合，也透過文化批判使教會問題得以被公開討論。可以說，他提出了問題的方向，而後來的改革者則在此基礎上給出了更為明確的神學回答。

因此，伊拉斯謨在歷史中的位置，並非宗教改革的對立者，而是一位處於轉折之中的過渡性人物。他既無法完全停留於中世紀體系之內，也未走向宗教改革的徹底立場，思想所呈現的張力，正反映出十六世紀初期歐洲神學轉型的複雜性。³⁴

第六節 小結

綜合本章之分析，可以看出伊拉斯謨的人文主義神學，並非建立在嚴密教義體系之上，而是一種結合語文學方法、教育理想與道德關懷的整體性信仰理解。他透過「回到源頭」(ad fontes)的學術取向，使聖經原文與早期教會傳統重新成為神學反思的核心。同時，藉由著作與教育推動，他強調內在敬虔與基督樣式的生命，使信仰從制度與形式中被重新導向生命實踐。

³² Miller, Clarence H., ed., *The Battle over Free Will*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2012), 1–26.

³³ Rupp, E. Gordon, ed., *Luther and Erasmus: Free Will and Salvation*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9), 35–58.

³⁴ McGrath, Alister E., *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John Wiley, 2021), 72–77.

在方法論層面上，伊拉斯謨所倡導的語文學與歷史研究，改變了神學建構的基礎，使詮釋工作逐漸從依賴權威轉向回歸文本。這一轉變不僅提升了聖經理解的精確性，也為後來宗教改革者提供了關鍵工具，使神學能建立在更直接面對經文的基礎之上。透過印刷文化與跨國學術網絡的發展，其思想得以廣泛流通，進一步促成歐洲整體宗教意識的轉變。

然而，在神學核心問題上，伊拉斯謨的立場亦顯現其限制。他強調道德更新與人對恩典的回應，卻未對罪的深層性與救恩的確據提出明確而系統性的論述。當教會危機從道德層面深化為教義與權威的問題時，其溫和改革取向逐漸顯得不足。正是在此處，後來的宗教改革者開始在其基礎上作出更具決斷性的神學發展。³⁵

因此，若從歷史與神學的整體脈絡來看，伊拉斯謨可被理解為一位「預備者」與「過渡者」。他提出了重新閱讀聖經、批判教會形式主義與強調內在信仰的問題意識，卻未進一步完成對恩典、人性與救恩論的重構。這些尚未被充分解決的神學張力，正成為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得以展開的關鍵起點。

基於此一脈絡，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等宗教改革者，並非在真空中發展其神學，而是在承接人文主義方法與問題意識的基礎上，加以深化與修正。路德透過對聖經的重新詮釋，強調人完全倚賴上帝恩典的救恩理解；加爾文則在系統化神學建構與聖經講解中，進一步發展出一套兼顧文本忠實與教義整合的神學體系。³⁶

因此，可以說，伊拉斯謨所代表的人文主義神學，提出了宗教改革的「問題」，而宗教改革者則進一步給出了「答案」。兩者之間既存在延續性，也呈現出關鍵性的斷裂。正是在這種既承繼又超越的關係中，十六世紀的神學轉型得以被完整理解。

³⁵ De Gruchy, John W., *John Calvin: Christian Humanist & Evangelical Reformer* (Oregon: Cascade Books, 2009), 12–19.

³⁶ 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80-86。

基於上述觀察，下一章將進一步探討宗教改革者如何承接並轉化人文主義的方法，特別聚焦於路德與加爾文在聖經詮釋、恩典論與教會權威上的發展，藉此說明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既連續又張力性的關係。

第四章 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神學回應

十六世紀初的宗教改革，並非一場單純由制度弊端所引發的教會更新運動，而是一場深刻的神學重構。在人文主義興起與教會危機交織的歷史情境中，「何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再次成為核心問題。當時的思想氛圍一方面強調回歸古典文本與語文原典（*ad fontes*），另一方面試圖透過教育與理性修復教會與社會。然而，這樣的改革路徑，是否足以回應人與上帝之間最根本的關係問題，成為關鍵分水嶺。

本文主張：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神學，並非人文主義改革運動的延伸，而是在其方法論基礎上所進行的一次決定性神學重構。馬丁路德一方面承接人文主義「回到源頭」的語文學取向，使聖經重新成為神學的中心；另一方面，則透過對「因信稱義」的重新詮釋與對自由意志的批判，徹底修正人文主義對人性與理性的樂觀預設。由此所形成的新教神學，不再以倫理改善或文化更新為核心，而是以福音宣告、恩典主權與救恩確信為其根本關懷，從而構成對中世紀教會與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整體性神學回應。³⁷

第一節 從人文主義改革到福音性的突破

美國學者邁克·馬辛（Michael Massing, 1952-）於《致命的紛爭》（*Fatal Discord*）中對伊拉斯謨與馬丁路德之關係，提供了一個極具洞見的歷史詮釋。他指出，兩人並非一開始即站在對立面，反而在宗教改革初期，皆懷抱對教會更新的共同期待。然而，正是在這種「共享改革願景」的基礎上，雙方最終的決裂，才更顯其神學分歧的深刻性與不可調和性。³⁸

首先，在「共同點」方面，兩人皆對晚期中世紀教會的敗壞深感不滿。伊拉斯謨透過諷刺作品與學術著作，批判教士的無知、迷信與道德敗壞；路德則在贖罪券事

³⁷ McGrath, Alister E., *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21), 63–68.

³⁸ Massing, Michael, *Fatal Discord: Erasmus, Luther, and the Fight for the Western Min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8), 35–52.

件中公開挑戰教會權威。兩者同樣主張回歸聖經文本，反對僵化的經院神學傳統，並認為教會需要更新。然而，這些表面上的一致，實際上建立在不同的神學預設之上。³⁹馬辛特別指出，伊拉斯謨的改革，是一種「文化與倫理導向」的改革。他相信透過教育、語文學、與道德操練，人類可以逐步被改善，教會亦能因此恢復其原有的純正。這種觀點深受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影響，強調理性、節制與內在敬虔。

相對而言，路德的改革則具有強烈的「救恩論導向」。他關心的核心問題，不是教會如何變得更好，而是罪人如何在上帝面前得以稱義。馬辛認為，這種差異使兩人即使使用相似語言（如「回到聖經」），實際上卻在處理不同問題。對伊拉斯謨而言，聖經是道德與智慧的泉源；對路德而言，聖經是宣告救恩的神聖話語。⁴⁰因此，雙方的分歧並非偶然，而是源於兩種不同的改革路徑：伊拉斯謨試圖透過教育與理性逐步修復教會；路德則認為唯有福音真理的重新發現，才能徹底翻轉人與上帝的關係。這種從「漸進更新」到「福音突破」的轉向，正是宗教改革得以成形的關鍵。

然而，若僅停留在「改革路徑的差異」，仍不足以說明宗教改革何以最終導向一場神學上的斷裂。要理解這一轉變，必須進一步探討路德如何在既有的人文主義學術環境中，形成其獨特的神學立場。

第二節 馬丁路德與人文主義

馬丁路德並非拒絕人文主義，反而在神學形成過程中，深受人文主義學術方法的影響。文藝復興時期所提倡的 *ad fontes*（回到源頭），促使學者重新關注希臘文與希伯來文原典，這對聖經研究帶來革命性轉變。路德正是在這一學術氛圍中，逐步形成其以聖經為中心的神學取向。⁴¹

³⁹ Olin, John C., ed., *Christian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Erasmu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120–126.

⁴⁰ 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59–63。

⁴¹ Kristeller, Paul Oskar, *Renaissance Thought: The Classic, 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72–81.

在人文主義的影響下，路德不再僅依賴拉丁文《聖經武加大譯本》（Vulgate），而是積極使用原文文本進行釋經。此一轉向，與他在威登堡大學的教學職分密切相關。路德於 1511 年前往威登堡（Wittenberg），並於 1512 年取得神學博士學位後，正式成為威登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之聖經神學教授。在此之後，他持續講授詩篇、羅馬書與加拉太書，並在講解過程中，逐步發展出一種結合語文學方法與神學反思的詮釋模式。這種方法既承接人文主義對文本精確性的重視，又超越其純學術目的，轉向以福音為核心的神學理解。⁴²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一長期的教學與釋經歷程中，路德開始重新思考「上帝的義」與「人的得救」之關係。透過對保羅書信的深入研究，他逐漸從中世紀傳統的功德觀轉向一種以信心與恩典為中心的救恩理解。換言之，威登堡的教學場域，不僅是學術訓練的場所，更成為宗教改革神學孕育與轉化的關鍵空間。

此外，印刷術的發展，對宗教改革具有決定性影響。自十五世紀中葉約翰內斯·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活字印刷術以來，書籍的生產與流通大幅提升。聖經與神學著作不再局限於修道院與學術圈，而能迅速進入更廣泛的讀者群體。⁴³路德的著作，包括《九十五條論綱》（The Ninety-Five Theses）與後續講章，正是透過印刷媒介迅速傳播，形成廣泛影響。

尤其重要的是，路德於 1522 年完成新約德文翻譯，並於 1534 年出版完整聖經。此舉不僅是語言上的轉譯，更是神學上的宣告：上帝的話語應直接臨到信徒，而非經由教會階層壟斷。⁴⁴這一發展，與人文主義推動語文教育與文本普及的理想形成共鳴，但其結果卻超越文化復興，轉而成為信仰更新的動力。

因此，可以說，若無人文主義的語文學基礎與印刷術的技術支持，宗教改革難以迅速擴展。然而，路德最終所追求的，並非文化復興，而是上帝話語權威的重新確

⁴² D'Aubigné, J. H. Merl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7), 102–110.

⁴³ 陶理主編，《基督教二千年史》，396–426。

⁴⁴ McGrath, *Reformation Thought*, 74–79.

立。而這一發展，也為其後「因信稱義」教義的形成，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歷史與神學基礎。

第三節 路德的神學突破：聖經觀、理性與恩典

路德神學的核心突破，不僅體現在「因信稱義」教義上，也深刻反映在其對聖經、理性與恩典之關係的重新界定。

在「聖經觀」方面，路德主張 *sola Scriptura*（唯獨聖經）。然而，此一原則並非僅指權威來源的轉移，更涉及詮釋方式的改變。⁴⁵路德把「上帝旨意的隱藏難知」與「聖經的明晰易懂」分開來，是非常有啟發性的。聖經的明白易懂有兩種，「內在的」明白易懂性「需要聖靈的同在」，「否則連聖經中的一個小字母也沒有人可以理解」。而「外在的」明白易懂性「則沒有任何一點東西是模糊難懂或含糊其詞的」。對路德而言，聖經不是一套需要人以理性加以掌握的知識體系，而是上帝主動向人說話的場所。聖經的中心乃是基督，因此一切經文的理解，皆需指向福音。⁴⁶

在「理性」的角色上，路德採取一種批判性的肯定。他並未全然否定理性在世俗領域中的價值，反而承認其在法律、教育與社會秩序中的功能。然而，在關乎救恩之事上，理性無法引導人認識上帝，甚至可能成為阻礙。⁴⁷在「恩典」的理解上，路德強調其絕對性與主動性。恩典不是補充人之不足，而是完全取代人的功德體系。人在得救之事上完全被動，只能透過信心領受上帝在基督裡所成就的一切。此一觀點，使路德神學與人文主義之人性樂觀論形成鮮明對比。⁴⁸

⁴⁵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著，《加爾文基督教要義 上冊》，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翻譯小組譯（台北市：加爾文出版社，2011），I.vi.1-3。

⁴⁶ 麥格夫，《歷史神學》，181-190。

⁴⁷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2), 94-97.

⁴⁸ Bavinck, Herman, *Our Reasonable Faith*, trans. 趙中輝 (Taipei: Reformed Publishing House, 2022), 241-248.

因此，路德的突破在於：將人文主義所提供的工具（語文學、文本研究）徹底納入一個以福音為中心的神學架構之中，同時拒絕其對理性與人性之過度信任。在上述三個面向中，路德已逐步建立一個以福音為中心的神學框架。然而，這一框架真正的核心，乃是在其對「人如何在上帝面前被稱為義」這一問題的回答上達到頂點。換言之，唯有透過「因信稱義」的教義，這一神學突破才獲得其最完整的表達。

第四節 「因信稱義」：宗教改革神學的核心突破

在宗教改革初期諸多神學議題之中，「因信稱義」無疑構成整個新教神學最核心且最具決定性的突破。若說人文主義為宗教改革提供了方法論上的資源，那麼「因信稱義」則是其在教義層面上的根本轉向。此一教義不僅回應了中世紀晚期教會的救恩體系，也重新界定了人、上帝與救恩之間的關係。⁴⁹

路德對「稱義」的理解，源自其對保羅書信，特別是羅馬書的重新詮釋。在中世紀神學傳統中，「稱義」常被理解為一個內在更新的過程，即上帝透過恩典逐步改變人，使其在本質上變得義。然而，路德所謂的「塔樓經驗」(Turmerlebnis)，主要見於其 1545 年為拉丁文著作全集所撰寫的序言中。⁵⁰在該文中，他回顧自己早年研讀《羅馬書》時，對「上帝的義」產生根本性的重新理解，從原先視其為審判標準，轉而理解為上帝白白賜予罪人的義。此一轉變，使他自述「如同重生，進入敞開的天國之門」。值得注意的是，此經驗並非當時即時記錄，而是路德晚年對其神學發展歷程的回顧性敘述，學界多將其理解為其救恩論轉向的神學象徵，而非單一歷史的瞬間。因此，「稱義」不再是一種內在變化的過程，而是一種法律性的宣告 (forensic declaration)。⁵¹人之所以被稱為義，不是因為其本身已經成為義，而是因為基督的義

⁴⁹ 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143–163。

⁵⁰ McGrath, *Reformation Thought*, 85–90.

⁵¹ 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164–168。

歸算（*imputed*）給他。這一觀點徹底顛覆了以功德為基礎的救恩體系，也使人從不斷追求自我完善的焦慮中釋放出來。

在此脈絡中，「信心」被重新界定為領受恩典的唯一途徑。對路德而言，信心並非一種道德行為或人類功德，而是對上帝應許的信靠（*fiducia*）。這種信靠本身也是上帝所賜的，使人能夠完全依附於基督，而非倚靠自身的行為或努力。因此，「唯獨信心」（*sola fide*）與「唯獨恩典」（*sola gratia*）密不可分，共同構成宗教改革救恩論的核心。⁵²

這一教義的提出，直接挑戰了當時教會以聖禮與善功為中心的救恩結構。在中世紀晚期，救恩被視為一個合作過程（*cooperation*），即人需配合上帝的恩典，透過善行、懺悔與聖禮逐步達致稱義。然而，路德認為，若救恩仍有任何部分依賴於人的努力，則人將永遠無法獲得確信。因為人無法確定自己是否已達到足夠的義，或是否真正符合上帝的標準。

因此，「因信稱義」不僅是一項教義主張，更是一種存在性的釋放。它使人在面對上帝時，不再以恐懼與不安為主導，而是以信靠與確信為基礎。這也是為何路德如此強調此教義的不可妥協性，甚至視其為「教會興衰之所在」（*articulus stantis et cadentis ecclesiae*）。⁵³

與伊拉斯謨相比，此一教義更凸顯出兩者在神學方向上的根本差異。伊拉斯謨雖強調恩典的重要，但仍保留人類自由意志在救恩中的角色，使人能在某種程度上回應或配合上帝的作為。相對地，路德則認為，人在罪中完全無能（*total inability*），其得救完全出於上帝的主權恩典。這使得「因信稱義」不僅是救恩論的核心，也成為理解自由意志之爭的關鍵背景。

⁵² Herman Bavinck, *Our Reasonable Faith*, 250–255.

⁵³ Rupp, E. Gordon, ed., *Luther and Erasmus: Free Will and Salva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9), 88–95.

進一步而言，「因信稱義」也重新塑造了教會與信徒生活的整體圖像。若人已因信稱義，則善行不再是獲取救恩的手段，而是救恩的結果。這使基督徒的倫理生活，從「為得救而行善」轉變為「因得救而行善」。如此一來，倫理不再建立於恐懼或功德計算，而是出於對上帝恩典的回應。

總體而言，「因信稱義」構成宗教改革神學最關鍵的轉折點。它不僅重新詮釋聖經中的核心信息，也對中世紀神學體系提出根本性挑戰。在此教義之下，人文主義所強調的人性潛能與理性能力，顯得無法回應罪與救恩的終極問題。相對地，路德以福音為中心，提出一種完全以恩典為基礎的救恩理解，從而奠定新教神學的根基。

因此，「因信稱義」不僅構成宗教改革神學的教義中心，也成為理解路德與其時代其他改革聲音之間差異的關鍵所在。正是在此一問題上，人文主義所提供的資源顯得不足，而新教神學則展現出其獨立且決定性的方向。

第五節 自由意志之爭⁵⁴

在此脈絡中，克拉倫斯·米勒（Clarence H. Miller, 1930-2019）於（*The Battle over Free Will*）指出，這場論戰之所以具有關鍵性，乃在於它不僅涉及人類能力的問題，更關乎救恩確信的根基。米勒認為，伊拉斯謨試圖維持一種神學上的平衡，使人既不致落入宿命論，也不致否定恩典的必要；然而，這種平衡在路德看來，反而削弱了福音的徹底性。⁵⁵

若從更根本的層面來看，自由意志之爭實際上觸及一個核心問題，即「上帝的主權」與「人的自由」之間應如何被理解與界定。伊拉斯謨主張，在上帝的恩典運作之下，人仍保有某種回應的能力，此一能力雖然有限，卻是真實存在的。他在《論自

⁵⁴ 本節部分外文文獻之翻譯與摘要整理過程，使用 Google 翻譯及人工智慧工具作為輔助，相關內容已由作者進一步校訂與整合。

⁵⁵ Miller, Clarence H., ed., *The Battle over Free Will*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12), xiii–xviii.

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 1524)中指出，人雖然軟弱，仍非全然無能，而是在恩典的扶助下能夠轉向善；否則，聖經中的命令與勸勉將失去其意義。⁵⁶

相對地，路德則在《論被捆綁的意志》(De servo arbitrio, 1525)中，徹底強調神的主權，並強烈批判伊拉斯謨對自由意志的保留。他認為人的意志在罪的轄制之下，並非中立，而是被動且受制的。路德甚至以強烈語氣指出，人之意志「如同被騎乘的獸」，不是被上帝引導，便是被罪與撒但所驅使，而不存在一個自主決定的中立領域。⁵⁷此一立場並非否認人作為受造者的存在，而是指出人在墮落狀態中的根本無能。

進一步而言，這場論戰亦涉及對「人的責任」與「罪的影響」之不同理解。伊拉斯謨認為，若完全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則責任的概念將無從成立；因為責任預設能力，人之所以被要求悔改與行善，乃是因其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回應上帝的呼召。相對而言，路德則從罪的全面性出發，主張人的敗壞不僅影響其行為，更深入其意志本身，使人無法憑自身力量選擇善或尋求上帝。即便如此，人仍須為其罪負責；然而，此一責任並不建立於其能力之上，而是建立於其作為受造者對上帝的關係之中。這一觀點雖帶有張力，卻正顯示路德神學試圖同時維護神的主權與人的責任。

真正不可化解的分歧，並不僅在於自由意志本身，而在於「神學應提供何種確定性」。如同馬辛所指出，伊拉斯謨傾向於保留神學中的模糊性與張力，以維持倫理責任與理性謙遜；而路德則堅持，唯有毫不妥協的確定性，才能拯救在罪與恐懼中掙扎的人心。對路德而言，若人的得救在任何程度上依賴其自身意志，則人將永遠陷於不確定之中，無法真正確信自己是否已被上帝接納。正如他所強調的：「若將救恩交付於人之意志，良心將永無安息之日。」⁵⁸

⁵⁶ Ibid., 37–45.

⁵⁷ Rupp, *Luther and Erasmus*, 120–132.

⁵⁸ Massing, *Fatal Discord*, 311–320.

因此，自由意志之爭在早期宗教改革的脈絡中，不僅是一場個別神學家的辯論，更是一場關於「福音本質」的神學碰撞。一方面，是延續人文主義傳統、重視倫理形成與理性秩序的神學路徑；另一方面，則是以罪的徹底性與恩典的絕對性為出發點，強調救恩完全出於上帝主權的福音性神學。這兩種取向，在語言上或許仍共享某些基督教傳統用語，但在其內涵與關懷焦點上，已產生根本性的分歧。

這場論戰實際上揭示了兩種神學方向：一者重視倫理形成與理性節制，試圖在神人關係中保留合作的空間；另一者則強調救恩確信與恩典主權，主張人在得救之事上完全被動。這種差異，使雙方最終無法調和，也標誌著宗教改革神學逐漸脫離人文主義框架，走向其獨立發展的關鍵時刻。⁵⁹

由此可見，自由意志之爭並非一場孤立的教義辯論，而是整個宗教改革神學轉向的集中展現。透過此一爭論，路德不僅釐清了人與恩典的關係，也進一步鞏固了以「因信稱義」為核心的神學架構，使新教神學在面對人性、罪與救恩問題時，展現出一種截然不同於中世紀與人文主義傳統的回應。

第六節 結論

綜合本章各節之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神學，乃是在特定歷史處境中，對人文主義與中世紀教會傳統所提出的一種整體性神學回應。這一回應並非單向的接受或拒絕，而是在張力中進行選擇、轉化與重構。

首先，在方法論層面，新教神學明確承接了人文主義的語文學成果與「回到源頭」(ad fontes)的學術精神。透過原文聖經的研究與印刷術的普及，聖經不再僅屬於教會階層，而成為信徒可以直接接觸與理解的權威文本。此一發展，使神學不再依附於經院體系，而逐漸轉向以聖經為中心的詮釋模式。⁶⁰然而，在教義核心上，新教

⁵⁹ 麥格夫，《歷史神學》，172–176。

⁶⁰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103–108.

神學則對人文主義的人性觀與理性觀提出根本性的修正。透過「因信稱義」的教義，路德徹底否定了人類在救恩中的主動角色，並將一切歸於上帝的恩典與基督的工作。這不僅重構了救恩論，也重新界定了信心、善行與教會的功能。⁶¹

此外，在自由意志之爭中，新教神學進一步顯明其關懷焦點並非單純的哲學或倫理問題，而是「人如何在上帝面前獲得確信」。相較於伊拉斯謨試圖維持神學張力與倫理責任的平衡，路德則選擇以福音的確定性作為最終標準，強調唯有完全依賴恩典，人才能從罪與不安中得著釋放。

因此，可以說：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神學回應，具有三個鮮明特徵。其一，是方法上的更新，透過人文主義工具，使聖經重新成為神學中心；其二，是教義上的突破，以「因信稱義」重構整個救恩論；其三，是關懷上的轉向，從倫理改善轉向救恩確信。⁶²

最終，路德與伊拉斯謨之間的分歧，並不僅代表兩種不同的改革策略，而是兩種不同的神學視野：一者以文化與理性為媒介，尋求教會的漸進更新；另一者則以福音宣告為核心，追求人與上帝關係的根本翻轉。正是在這樣的對比之中，新教神學逐漸確立其獨特的身份與方向。

綜上所述，本章顯示：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神學回應，並非對既有思想的簡單修正，而是一種以福音為中心的重構工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文主義既是催化劑，也是被超越的對象；而路德則在此張力之中，提出一套以聖經為權威、以恩典為基礎、以信心為途徑的神學體系。正是這樣的回應，使宗教改革不僅成為歷史事件，更成為西方基督教神學發展的一個轉折點。

⁶¹ McGrath, *Reformation Thought*, 101–108.

⁶² De Gruchy, John W., *John Calvin: Christian Humanist & Evangelical Reformer* (Oregon: Cascade Books, 2009), 22–30.

第五章 人文主義與新教神學之間的承接與分歧

本章旨在探討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神學之間的承接與分歧，並以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之思想互動為核心，進行神學層面的整體評估。過往研究往往傾向以對立框架理解二者之衝突，將其簡化為正誤之爭，然而此種詮釋方式容易忽略其背後更深層的神學問題與歷史動力。

美國學者邁克·馬辛（Michael Massing, 1952-）於《致命的紛爭》（*Fatal Discord*）中指出，兩者之決裂並非單一議題所致，而是涉及教會改革路徑、信仰知識論、人性論與救恩論等多重層面之差異。⁶³因此，本章不以判定優劣為目的，而是分析其方法論上的連續性與神學上的分歧，並進一步評估此張力對後世神學發展之影響。

本文主張，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神學並非單純對立，而是在歷史進程中形成一種未竟的張力結構。此張力既反映西方基督教由中世紀走向現代性的轉折，也揭示信仰、理性、制度與恩典之間長期存在的內部辯證。其意義不僅屬於十六世紀，亦對當代教會與神學反思具有持續性啟發。⁶⁴

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神學之間的關係，不應被簡化為對立或斷裂，而應理解為一種既相互承接、又彼此衝突之歷史張力。伊拉斯謨與路德之爭，實際上反映十六世紀西方基督教在面對權威、恩典、人性與教會制度時所產生之深層危機。此一張力不僅塑造宗教改革本身，亦深刻影響近代西方神學與教會發展。

⁶³ Michael Massing, *Fatal Discor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8), 15–22.

⁶⁴ Alister E.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Hong Kong: 天道書樓, 2020), 184–188.

第一節 神學方法上的連續性：宗教改革並非憑空產生

儘管路德後來與伊拉斯謨產生激烈衝突，然從方法論角度觀之，宗教改革並非自真空中生成，而是在相當程度上承接了文藝復興人文主義之成果。更進一步而言，教會改革本身亦非十六世紀突然爆發之歷史事件，而是基督教歷史中持續存在之內部更新運動。

自初代教會以來，教父們即不斷透過教義辯證、異端爭議與聖經詮釋，逐步建構基督教信仰之核心內容。亞他那修（Athanasius, 296-373）於尼西亞信經爭議中對基督神性的辯護、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354-430）對恩典與原罪之論述，皆可視為教會歷史中重要之「改革性」工作。⁶⁵換言之，基督教教義並非一次完成，而是在不斷修正、澄清與辯證中逐步形成。因此，宗教改革不應被理解為與歷史完全斷裂之革命，而應視為長期改革傳統之延續與集中爆發。

中世紀晚期，對教會制度與神學腐敗之批判逐漸增強。瑞米尼的貴格利（Gregory of Rimini, 1300-1358）重新強調奧古斯丁式恩典論，對人類墮落與神恩主權提出更深刻之反省；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29-1384）則批判教會財富與教皇權威，主張聖經高於教會制度；約翰胡斯（John Huss, 1373-1415）承繼威克里夫思想，推動波希米亞地區之教會改革，最終甚至因此殉道。這些改革先鋒雖未能全面改變教會體制，卻逐步累積改革意識，使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得以形成廣泛回響。⁶⁶

因此，伊拉斯謨與路德並非橫空出世之改革者，而是站在長期歷史積累之上。宗教改革之爆發，實際上是神學、人文、教育、政治與制度危機長期交織後之結果。

首先，伊拉斯謨與路德皆強調「回到源頭」（ad fontes）之研究取向。伊拉斯謨透過《伊拉斯謨 1516 年新約聖經校訂本》（Novum Instrumentum Omne）之出版，致

⁶⁵ J. N. D. Kelly, 《早期基督教教義》（新北市：中華福音，2010），245–267。

⁶⁶ 陶理主編，《基督教二千年史》（香港：海天書樓，2004），312–320。

力於以希臘文新約校訂拉丁通行本，推動文本批判與經文更新。其目的不僅在於學術修訂，更在於重新尋回基督教信仰最初之純粹性。路德則積極運用原文研究成果，並將聖經翻譯為德文，使之進入平信徒之日常語境。⁶⁷此一對原典之重視，構成宗教改革重要之知識基礎。

人文主義對語言與教育之重視，亦深刻影響宗教改革之發展。文藝復興人文主義高度重視語言學與古典教育，因其相信，語言不僅是知識傳遞工具，更是理解真理之途徑。透過回到原始文本，人文主義者試圖擺脫中世紀經院哲學過度依賴二手權威之問題。希臘文與希伯來文研究之復興，使聖經研究逐漸脫離僅依附拉丁通行本之狀態，並促使神學重新面向文本本身。⁶⁸

此一學術轉向亦改變了中世紀大學之功能。中世紀大學原本主要以培養神職人員、維護教會知識體系為目的，然至十五、十六世紀，人文主義逐漸改變其教育內容與知識方向。修辭學、歷史、語言學與古典文學的重要性提升，使大學不再只是經院神學之延伸，而逐漸成為思想辯論與文化更新之中心。威登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更成為宗教改革重要之思想基地，學術共同體、印刷術與城市網絡彼此結合，使宗教改革超越地方事件，而逐漸成為全歐洲性之運動。

此外，伊拉斯謨與路德亦共同展現對既有教會制度之批判精神。十六世紀前夕，西方教會之問題已不僅屬個人道德層面，而逐漸形成制度性危機。教廷龐大之財政需求使贖罪券制度大幅擴張；聖職買賣（simony）、多重聖職兼任，以及神職人員世俗化等問題普遍存在，造成教會逐漸失去其屬靈權威。

對一般平信徒而言，拉丁禮儀與複雜教會制度亦逐漸造成信仰疏離。信仰越來越成為由教會中介控制之體系，而非直接面對聖經與福音之生命實踐。伊拉斯謨於《愚人頌》中以諷刺方式揭露教會虛偽、迷信與形式化信仰；路德則於《九十五條論

⁶⁷ Johan Huizinga, *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2018), 98–105.

⁶⁸ Paul Oskar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34–46.

綱》中公開挑戰贖罪券制度。⁶⁹此種批判並非偶發，而是根源於對教會更新之共同關懷。然而，二者之差異亦逐漸浮現。伊拉斯謨傾向透過教育、敬虔與道德更新修補制度；路德則逐漸認為，制度本身已成為阻礙福音之結構性問題。因此，宗教改革在方法層面雖深受人文主義滋養，卻也在進一步發展中逐漸超越人文主義原本所能承載之範圍。

綜上所述，若完全切割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關聯，將難以解釋宗教改革何以能迅速結合學術與群眾動能，並形成廣泛影響之歷史運動。宗教改革並非突然降臨之革命，而是在長期思想、教育與制度張力之中逐步孕育而成。然而，若在方法論與改革意識上可見承接性，則在人性與救恩理解上，伊拉斯謨與路德之差異便逐漸浮現。此種差異最終不僅影響其神學立場，更決定其對教會改革之不同想像。

第二節 對人性的理解：回應可能與意志受限⁷⁰

若在方法論上可見連續性，則在人性論層面，伊拉斯謨與路德之差異逐漸顯現。伊拉斯謨之人性論深受古典人文主義與教父傳統影響。他雖承認原罪對人性的影響，然並未主張人性已全然敗壞至無法回應上帝。在其理解中，上帝形象雖因罪而受損，卻未徹底毀壞。因此，在神恩典之光照下，人仍具某種程度之回應能力，能夠透過教導、勸勉與屬靈操練逐步轉向上帝。⁷¹

此一觀點與人文主義對教育功能之重視密切相關。伊拉斯謨相信，人具有可塑性，而教育與敬虔操練能夠幫助人朝向良善與真理前進。若人完全失去回應能力，

⁶⁹ Desiderius Erasmus, *The Praise of Folly and Other Writings*, ed. Robert M. Adam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9), 52–60.

⁷⁰ 本節部分外文文獻之翻譯與摘要整理過程，使用 Google 翻譯及人工智慧工具作為輔助，相關內容已由作者進一步校訂與整合。

⁷¹ John C. Olin, ed., *Christian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118–124.

則倫理責任與教會教育之意義將難以成立。因此，他試圖維護一種最低限度的人類回應可能性。

相較之下，路德則從奧古斯丁恩典論、其個人宗教經驗，以及對保羅書信之詮釋出發，強調人在罪中的徹底無能。在《論被捆綁的意志》中，路德指出，人之意志並非中立，而是受罪所轄制。⁷²罪不僅削弱人性，更深刻扭曲人的意志與存在狀態。人在罪中不只是軟弱，而是無法憑自身力量尋求神。若無上帝主動施恩，人便無法真正轉向救恩。

因此，二者之差異並非僅在程度上的不同，而是對罪之本質有不同理解。伊拉斯謨認為罪使人受損，但未完全失去回應能力；路德則認為罪使人整體性地陷入敗壞，連意志本身都已失去自由。

若將二者置於對話脈絡中觀察，其分歧更為清晰。伊拉斯謨關切的是，若人完全失去回應能力，則教會之教導與倫理勸勉將失去實質意義，上帝對人的命令亦難以理解；路德則質疑，若人仍保有主動回應之能力，則恩典是否仍為純粹之恩典。此立場可能削弱罪之嚴重性，並使救恩部分建立於人之能力之上。從神學評估角度而言，二者之分歧反映不同之問題意識。伊拉斯謨由倫理與牧養問題出發，關注人之可教導性與責任；路德則由救恩論出發，強調人在神面前之徹底被動性。⁷³故其差異並非單純樂觀與悲觀之對比，而是神學起點與關懷焦點之不同。

在此意義下，二者之張力具有結構性功能：一方面，教會需承認人之有限與罪性；另一方面，亦需肯認人在恩典中被更新之可能。若偏向任一極端，皆可能導致神學與牧養之失衡。因此，人性論之差異最終進一步影響二者對救恩本質之理解。當「人是否仍具有回應能力」成為核心問題時，雙方之爭論亦逐漸由倫理與牧養層面，進入救恩論核心。

⁷² E. Gordon Rupp, ed., *Luther and Erasmus: Free Will and Salva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60–176.

⁷³ Herman Bavinck, 《改革宗教義學》（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22），213–220。

第三節 對救恩的理解：協力論與單方恩典之張力

伊拉斯謨與路德之爭，最具代表性者為自由意志問題，然其核心實為救恩論之分歧。克拉倫斯·米勒（Clarence H. Miller, 1930-2019）於（*The Battle over Free Will*）指出指出，伊拉斯謨與路德之爭，表面上是自由意志問題，實際上則涉及「誰是救恩真正主體」之根本神學問題⁷⁴。換言之，雙方爭論的核心，並非是否需要恩典，而是恩典是否容許任何人類主動性存在。

伊拉斯謨於《論自由意志》中主張，既然上帝命令人悔改與順服，則人必須在某種意義上具備回應之可能，否則命令將失去其道德意義。對他而言，上帝之公義與人的責任彼此相關。若人完全無法回應，則審判與勸勉都將失去基礎。因此，他主張人在恩典扶助下，仍具有有限而真實的合作可能。

此一觀點可被理解為某種「協力論」傾向，即救恩雖源於上帝恩典，但人仍需以自由回應參與其中。伊拉斯謨並非否定恩典的重要性，而是拒絕將人完全視為被動對象。

路德則於《論被捆綁的意志》中強烈反對此觀點。他認為，若救恩任何部分依賴人之合作，則恩典即不再純粹。⁷⁵人在罪中既已失去真正自由，便無法憑自身作出得救之選擇。救恩完全出於上帝，連信心本身亦為恩賜，因此人的一切誇口皆被排除。對路德而言，「唯獨恩典」（*sola gratia*）並非抽象教義，而是福音之核心。若人在救恩中仍保有某種主動性，則救恩最終仍可能建立於人的能力，而非神之憐憫。因此，他極力捍衛神恩之單方性與主權性。

此一爭論深刻影響後世新教神學發展。加爾文主義延續路德對恩典主權之強調，亞米念主義則較重視人的回應自由；近代神學中的相容論（*compatibilism*）亦

⁷⁴ Clarence H. Miller, ed., *The Battle over Free Will*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2012), xiii–xviii.

⁷⁵ Martin Luther, quoted in Rupp, *Luther and Erasmus*, 192–201.

試圖整合神主權與人責任之關係。⁷⁶由此可見，伊拉斯謨與路德之辯論並非歷史偶發，而是基督教救恩論中持續存在之核心張力。

因此，此一神學衝突不應僅被理解為十六世紀之學術論戰，而應視為基督教信仰長期面對之問題：在強調神恩主權之同時，如何理解人的責任與回應？而在強調人的回應時，又如何避免削弱恩典之絕對性？此種張力至今仍深刻影響教會對救恩、牧養與屬靈生命之理解。此種救恩論差異並非停留於抽象神學層面，而逐漸影響二者對教會、權威與改革方式之理解。換言之，神學上的分歧，最終亦導向教會實踐路徑之不同。

第四節 教會更新路徑的不同想像：改革或斷裂

在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差異中，教會更新之路徑亦呈現不同想像。伊拉斯謨主張透過教育、敬虔實踐與神職改革，由內部逐步更新教會。他相信，教會雖有腐敗與問題，但仍可透過知識更新、道德改革與靈性復興逐漸恢復教會健康。⁷⁷對伊拉斯謨而言，教會合一具有不可取代之價值，因此他對任何可能導致分裂之激進改革皆保持高度警覺。

此外，伊拉斯謨亦擔憂群眾運動與政治勢力介入宗教改革所可能帶來之後果。他認為，當宗教改革與政治權力結合時，容易導致暴力化與極端化，並使原本屬靈性的更新運動轉變為權力鬥爭。此種憂慮在後來歐洲宗教戰爭中某種程度上被歷史證實。

相較之下，路德則逐漸認為，當福音核心受到壓制時，妥協將無法維持真理。雖其初期未必意圖分裂教會，然而隨著與教會權威之衝突加劇，他逐漸認為改革必須承擔斷裂之代價。對路德而言，若制度已成為阻礙福音之工具，則真正的改革便

⁷⁶ Alister E. McGrath, *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John Wiley, 2021), 104–118.

⁷⁷ Hilmar M. Pabel, ed., *Erasmus' Vision of the Church* (Missouri: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1984), 77–85.

不可能僅停留於內部修補。⁷⁸此外，路德改革之所以最終發展為制度性分裂，亦與當時神聖羅馬帝國之政治結構密切相關。德意志諸侯長期對教廷財政與皇權控制不滿，使宗教改革迅速獲得政治支持。⁷⁹宗教改革因此不再只是神學運動，而逐漸與民族、經濟與政治因素交織，最終改變整個歐洲秩序。

從歷史結果觀之，路德式改革促成聖經普及、教義重整與教會制度更新，並重新強調因信稱義與福音核心，然亦導致教派分裂與長期宗教衝突。相對而言，伊拉斯謨之改革構想雖未成為主流，卻留下學術自由、宗教寬容與反對極端主義之重要遺產。

因此，歷史並未證明某一模式之完全成功，而是呈現兩種改革路徑各自產生之影響與限制。伊拉斯謨提醒教會，改革若失去節制與對話，可能走向破壞；路德則提醒教會，若缺乏對真理之堅持，改革將流於妥協與空洞化。然而，真正值得反思者，並非兩種改革模式孰優孰劣，而是原本可能彼此補充之力量，為何最終走向不可逆之決裂。此亦為《致命的紛爭》（*Fatal Discord*）所欲揭示之歷史悲劇。

第五節 《致命的紛爭》（*Fatal Discord*）的深層啟示：

張力的崩解⁸⁰

邁克·馬辛於《致命的紛爭》（*Fatal Discord*）中指出中以「致命的分歧」描述伊拉斯謨與路德之決裂，指出其悲劇性不僅在於衝突本身，更在於原本可能形成之互補張力最終未能維持。⁸¹伊拉斯謨代表理性、節制、文化教養與學術對話；路德則

⁷⁸ J. H. Merle D'Aubign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Michigan: Baker Books House, 1987), 201–214.

⁷⁹ Richard Harries and Henry Mayr-Harting, 《基督宗教簡明史》（台北市：城邦出版社，2006），188–194。

⁸⁰ 本節部分外文文獻之翻譯與摘要整理過程，使用 Google 翻譯及人工智慧工具作為輔助，相關內容已由作者進一步校訂與整合。

⁸¹ Michael Massing, *Fatal Discord*, 401–410.

代表福音核心、信仰確信與先知性批判。兩者原本皆渴望教會更新，也皆不滿當時教會制度之腐敗。然而，隨著神學立場逐漸極化，雙方最終失去共同語言。

因此，《致命的紛爭》（*Fatal Discord*）最深層之啟示，不在於誰對誰錯，而在於一場原本可能彼此補充之改革運動，如何最終走向不可逆之對立。悲劇不在於差異存在，而在於雙方最終失去承載差異之能力。若伊拉斯謨之立場得以持續發揮影響，宗教改革或許能保有更多對話、節制與文化整合空間；反之，若路德之批判聲音被壓制，教會亦可能失去對福音核心與制度腐敗之深刻反省。因此，問題並不在於差異本身，而在於缺乏能承載差異之結構。

當確信排擠謙遜、真理排擠對話、改革排擠合一時，原本具有建設性的張力便轉化為破壞性的對立。此一歷史經驗顯示，神學傳統之生命力，往往繫於其是否能維持多重向度之平衡。更深一層而言，伊拉斯謨與路德之決裂亦反映西方基督教進入現代性過程中的內部危機。當理性、權威、個人良知與制度信仰彼此衝突時，教會不再只是單一整體，而逐漸進入多元化與分裂化之歷史處境。此種張力不僅塑造宗教改革，也深刻影響後來西方思想、政治與文化之發展。

邁克·馬辛所謂 “fatal discord”，不僅指個人關係破裂，更象徵西方基督教內部原有平衡結構之崩解。人文主義所強調之理性、節制與文化教養，與宗教改革所強調之信仰確信與福音中心性，原本可能形成互補關係；然而，在十六世紀政治、制度與神學衝突加劇之下，此種互補性逐漸轉化為彼此排斥。⁸²

第六節 對當代教會與神學的意義

伊拉斯謨與路德之張力，對當代教會仍具重要啟發意義。首先，在真理與合一之關係上，教會需重新思考如何在堅持信仰核心之同時，避免不必要之分裂。歷史顯示，若僅強調合一而忽略真理，教會可能流於妥協與形式化；若僅強調真理而缺

⁸² Michael Massing, *Fatal Discord*, 401–410.

乏對話與謙遜，則可能導致持續分裂與彼此排斥。⁸³因此，真正成熟之教會，不僅需持守信仰核心，亦需學習在差異中維持群體關係。

在學術與敬虔之整合上，單一取向皆有其限制。過度強調知識與批判，可能使信仰流於冷漠理性；過度強調熱情與屬靈經驗，則可能導致反智傾向與神學薄弱。伊拉斯謨提醒教會，理性、教育與文化並非信仰之敵；路德則提醒教會，知識若失去福音核心，便可能淪為空洞形式。⁸⁴因此，教會需同時培養神學深度與屬靈生命。

再者，在制度改革與心靈更新之關係上，單純制度調整或個人靈性提升，皆不足以帶來全面更新。有效之改革需同時觸及結構與生命兩個層面。若只改革制度而忽略人的生命，改革可能流於新的權力形式；若只強調個人靈命而忽略制度問題，則可能無法真正回應不公義與腐敗。

此外，當代教會同樣面對類似張力：在堅持真理時，是否仍能保有對話空間；在追求改革時，是否仍能維持群體合一；在強調屬靈熱情時，是否仍願意進入深度思考與神學反省。伊拉斯謨與路德之歷史提醒教會，任何單一向度之絕對化，皆可能導致新的失衡。

當代教會同樣面對類似問題。例如，在網路媒體與群體動員快速發展之下，教會容易陷入立場化與極端化；不同神學傳統之間亦常缺乏真正對話空間。此種現象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宗教改革時期張力結構之延續。

第七節 結論：分歧之後的可能性

伊拉斯謨與路德之歷史衝突，不應僅被視為一次失敗的對話，而可理解為一項尚未完成之神學任務。路德提醒教會，福音之核心不可被模糊；伊拉斯謨則提醒，

⁸³ John R. W. Stott, 《心意更新的教會》(新北市：校園書房，2012)，87-94。

⁸⁴ 林鴻信，《系統神學(上、下冊)》(新北市：校園書房，2017)，522-531。

真理需以謙遜與對話承載。前者強調恩典之主權，後者強調人之責任與教養；前者推動制度性改革，後者維護文化、理性與學術空間。因此，本章之結論並非判定勝負，而在指出：基督教歷史中最具創造力之時刻，往往並非單一立場之勝出，而是多重張力得以被妥善維持之時。⁸⁵

從更宏觀之角度而言，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的關係，不應被簡化為「理性對信仰」或「文化對神學」之衝突，而應理解為西方基督教在現代性形成過程中的內部辯證。正是在此種張力之中，教會重新思考聖經權威、人性、恩典、制度與個人信仰之關係。

歷史上的分裂已成事實，然在當代神學與教會實踐中，如何在差異中尋求共存，仍是一項持續課題。或許，《致命的紛爭》（*Fatal Discord*）最終留下之問題並非「誰獲勝」，而是教會是否能在堅持真理之同時，仍保有承載差異與彼此對話之能力。因此，伊拉斯謨與路德之分歧，最終不僅屬於歷史，更成為教會持續面對之問題：當真理、恩典、理性與改革彼此拉扯時，教會是否仍能在堅持信仰核心之同時，保有謙遜、對話與共同體之可能。

⁸⁵ Alister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2), 33–41.

第六章 神學反思與當代意義

基督新教的回應、修正與今日教會的實踐

本論文前數章已探討伊拉斯謨之北方基督教人文主義、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神學，以及兩者之間在自由意志、恩典、教會改革與聖經詮釋上的衝突與互動。⁸⁶然而，若研究僅停留於十六世紀歷史事件之描述，則其學術價值仍屬有限。歷史研究真正的重要性，乃在於能否成為當代神學反思與教會實踐之資源。

事實上，伊拉斯謨與路德之間的爭論，並未隨宗教改革結束而消失。兩人所關注的人性問題、恩典與自由之關係、教會改革之方向，以及真理與合一的平衡，至今仍持續存在於不同宗派與教會處境之中。⁸⁷尤其在當代教會面對世俗化、信仰碎片化、消費文化、教派分裂與公共見證削弱等挑戰時，重新閱讀這段歷史，不僅有助於理解基督新教形成之背景，也能提供今日教會更成熟的神學視野。

本章將從當代神學與教會實踐的角度，重新思考宗教改革所留下的遺產。首先，探討基督新教如何承接並修正宗教改革傳統；其次，分析伊拉斯謨與路德之張力如何成為當代救恩論與教會論的重要資源；最後，進一步思考今日教會如何在教導、敬虔與牧養之間尋求整合，並回應華人教會處境中的挑戰。

第一節 基督新教對宗教改革傳統的承接與修正

基督新教的形成，深受宗教改革影響。特別是路德所強調之「唯獨恩典」（*sola gratia*）與「唯獨信心」（*sola fide*），至今仍構成多數基督新教教義的核心。⁸⁸

⁸⁶ Michael Massing, *Fatal Discord: Erasmus, Luther, and the Fight for the Western Mind* (New York: Harper, 2018), 1–20.

⁸⁷ Massing, *Fatal Discord*, 501–548.

⁸⁸ Alister E.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1998), 156–165.

宗教改革最大的貢獻之一，在於重新指出：救恩並非建立於人的宗教功德、道德成就或制度性功修，而是建立於上帝在基督裡白白賜下之恩典。⁸⁹人在上帝面前無法靠自身努力達致稱義，只能憑信心接受基督之救恩。此一教義在當代社會仍具重要意義。現代文化普遍強調效率、自我實現與成就價值，人容易將自身價值建立於能力、表現與社會認可之上。在此情況下，宗教改革所強調之恩典信息，對當代人有深刻的釋放性。它提醒信徒，人的價值首先來自上帝的接納，而非人的成功與表現。

然而，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新教歷史亦顯示，當教義立場被絕對化而缺乏謙卑時，容易導致教派分裂與彼此定罪。⁹⁰十六世紀後的基督新教世界，逐漸形成眾多宗派傳統，各自強調自身神學之純正性。雖然這有助於教義發展與信仰辨識，但也使教會時常陷入界線意識與彼此排斥之中。在此背景下，伊拉斯謨對和平、節制與對話的重視，便成為對基督新教傳統的重要提醒。伊拉斯謨雖未否定真理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基督徒在追求真理時，仍需保有謙卑與節制。若真理被以驕傲、羞辱或排斥他人的方式持守，教會將失去福音應有之見證。⁹¹

因此，當代基督新教在許多地區，已逐漸從宗派對抗模式，轉向合作與共同使命的模式。不同宗派之間開始共同參與聖經翻譯、神學教育、宣教與社會關懷工作。這種發展並非否定宗派差異，而是在承認差異的同時，重新尋求共同的福音使命。此亦可視為對宗教改革歷史的一種修正與成熟化發展。

⁸⁹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156–165.

⁹⁰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170–175.

⁹¹ Desiderius Erasmus, *The Complaint of Peace*, trans. an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6), 71–90.

第二節 恩典與責任：當代救恩論的再思⁹²

伊拉斯謨與路德在自由意志問題上的爭論，實際上觸及基督教救恩論最核心的問題，即人在救恩中的角色為何，以及恩典與人的回應應如何理解。⁹³此問題雖起源於十六世紀，但至今仍深刻影響當代教會的信仰實踐與神學理解。

若教會過度強調人的責任與選擇，則信仰容易滑向律法主義。人在此種處境中，往往將信仰理解為一種道德競賽或靈命績效制度。信徒可能不斷以聚會次數、服事表現、奉獻程度或屬靈經歷衡量自身價值，甚至以此評斷他人。當信仰逐漸成為一種「屬靈表現主義」時，人的焦點便不再是基督的恩典，而是自己的努力與成績。

在此情況下，路德所強調「因信稱義」便具有重要的醫治性意義。路德指出，人之所以能被稱義，並非因已成為義人，而是因基督的義被歸算於信徒身上。此一觀點提醒教會，人並非因完全而被上帝接納，而是在被接納之後，才逐漸被更新。恩典不是對成功者的獎賞，而是對罪人的拯救。⁹⁴然而，若對上帝主權與恩典產生錯誤理解，也可能導致另一種極端，即消極的宿命論。部分信徒可能因此認為，既然救恩完全出於上帝，人便無需積極回應，也無須努力追求聖潔與門徒生活。此種觀點容易削弱悔改、順服與屬靈操練的重要性，甚至使信仰流於消極的等待。

在此方面，伊拉斯謨則提供另一種提醒。他雖未否認恩典的重要，卻強調人對上帝呼召之回應仍是真實且必要的。⁹⁵對伊拉斯謨而言，恩典並未取消人的責任，反而使人能夠在上帝幫助之下，真實地活出順服與更新的生命。因此，人的回應並非與恩典競爭，而是在恩典中被成全。

⁹² 本節部分外文文獻之翻譯與摘要整理過程，使用 Google 翻譯及人工智慧工具作為輔助，相關內容已由作者進一步校訂與整合。

⁹³ Clarence H. Miller, ed., *The Battle over Free Will: Erasmus, Luther, and the Debate over Predestination and Free Will*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12), xiii–xx.

⁹⁴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189–194.

⁹⁵ Desiderius Erasmus, *On Free Will*, trans. Clarence H. Mill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45–63.

當代救恩論因此逐漸傾向一種較整全之理解，即承認救恩完全源自上帝主動之恩典，同時也承認人的回應在信仰歷程中的重要性。信心不是人的功德，卻是真實的回應；成聖不是靠人自力完成，卻也不是被動等待。聖靈在信徒生命中工作，同時呼召人進入順服、悔改與更新之歷程。

當代救恩論亦更加重視救恩之群體性與公共性。宗教改革時期的爭論，多集中於個人如何得救，但今日神學則逐漸意識到，救恩不僅關乎個人靈魂之歸宿，也涉及人際關係、群體生活與社會見證。真正的救恩不只是個人被赦免，更包括生命價值觀之更新、群體關係之修復，以及教會在世界中活出基督見證之使命。⁹⁶

因此，伊拉斯謨與路德之間的張力，對今日教會並非過時的歷史問題，而是持續提醒教會避免走向任何一種極端。當代教會需要在恩典與責任、上帝主權與人的回應之間，建立更成熟且整全之救恩理解。

第三節 真理與合一：教會公共見證的挑戰

當代教會雖與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處境不同，但在真理與合一之間的張力上，仍面對類似問題。今日教會常因政治立場、敬拜形式、神學細節、世代文化與教會治理模式而產生衝突。尤其在社群媒體時代，論戰與標籤化現象更加迅速，使基督徒容易以敵我方式理解彼此。⁹⁷

路德提醒教會，當福音核心受到扭曲時，教會不能以表面和平取代真理。若教會失去對福音核心之堅持，則所謂的合一，最終可能淪為妥協與空洞一致。因此，教會仍需保有辨別真理與守護信仰核心之勇氣。

⁹⁶ McGrath, *Historical Theology*, 170–175.

⁹⁷ Diarmaid MacCulloch, *The Reformation: A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2003), 617–640.

伊拉斯謨則提醒教會，若所有分歧都被視為背叛，則對話空間將完全消失。⁹⁸並非所有差異都涉及福音核心，許多爭論其實屬於文化偏好、傳統差異或次要教義。若教會無法區分核心與非核心問題，便容易陷入無止盡之對立。

因此，當代教會的重要課題之一，乃是重新學習如何在真理與合一之間建立成熟平衡。真正成熟的教會，並非完全沒有差異，而是能夠在差異中維持對基督的共同見證。

第四節 學術、敬虔與牧養的整合

伊拉斯謨與路德雖在神學立場上存在重大差異，但兩人皆深知「教導」對教會更新的重要性。伊拉斯謨重視語文訓練、教育改革與經典閱讀，反映出人文主義對知識與理性培育之重視。⁹⁹他相信，教會若缺乏教育與思辨能力，信仰便容易流於迷信、形式化與盲從。因此，他特別強調回到原典、閱讀聖經與培養信徒的文化素養。

這種對教育與知識的重視，對今日教會仍具有重要意義。¹⁰⁰當代教會在快速媒體文化影響下，信仰內容常被簡化為口號式、情緒式或碎片化資訊。部分教會過度依賴短影音、激勵式信息與即時感受，卻忽略長期而深入之教導。結果導致信徒雖長期聚會，卻缺乏對聖經、神學與教會歷史之基本理解，也缺乏辨別異端與錯誤教導之能力。因此，今日教會必須重新建立「教導的教會」之觀念。教會不僅是聚會場所，更應成為培育真理與生命更新之群體。講台信息不應僅停留於情緒鼓舞，而應兼具聖經深度、神學反思與生命應用。門徒訓練亦不應只是活動安排，而需幫助信徒建立整全世界觀與成熟信仰思維。

⁹⁸ Erasmus, *The Complaint of Peace*, 85–90.

⁹⁹ Desiderius Erasmus,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30.

¹⁰⁰ 林鴻信，《基督宗教與東亞儒學的對話：以信仰與道德的分際為中心》（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2009），201–220。

另一方面，路德則提醒教會，神學知識若不能導向福音宣講與生命更新，便容易失去其真正目的。¹⁰¹宗教改革的核心，不只是學術辯論，更是牧養與福音更新。路德強調講道、牧養與信徒對聖經之理解，皆應指向人與基督真實相遇。對他而言，神學不是少數學者之知識遊戲，而是關乎人的罪、恩典與救恩之生命問題。

此一觀點對當代教會同樣重要。部分教會雖重視神學教育，卻可能陷入另一種失衡，即知識化與理論化。當神學只停留於概念討論，而缺乏牧養溫度與生命關懷時，教會便容易產生距離感與屬靈冷漠。真正健康的教導，應當同時兼顧真理深度與生命關懷，使知識成為建造信徒生命之工具，而非彰顯優越感之資本。

學術、敬虔與牧養之整合，乃是當代教會極重要之課題。教會既不能反智，也不能只停留於理性；既不能只有情感熱情，也不能缺乏真理根基。成熟的教會應同時具備幾項特質，有深度之聖經教導、有系統之門徒培育、有思辨能力的信徒群體，以及有溫度的牧養關係。如此，神學才能真正成為塑造生命與更新教會的力量。

第五節 今日教會的實踐建議

本研究除透過歷史文獻與神學文本進行分析之外，亦藉由對牧者、傳道與神學教育工作者之訪談，進一步了解當代教會對「學術、敬虔與牧養」整合之實際觀察與處境反思。本次訪談目的，並非單純蒐集意見，而是希望透過第一線牧會與神學教育經驗，檢視伊拉斯謨所強調的「回到聖經、內在敬虔與生命更新」是否仍對今日教會具有實際意義。訪談亦試圖探討：在當代教會事工導向與快速變動的環境中，神學教育、屬靈生命與牧養實踐是否仍能維持平衡。

訪談結果顯示，無論是牧會現場的牧者與傳道，或神學院中的學者與教師，多數皆認同「學術、敬虔、牧養」三者之平衡，乃是今日教會極為重要，卻也逐漸失

¹⁰¹ Martin Luther,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in *Luther's Works*, vol. 31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57), 327–377.

落的核心。¹⁰²受訪者普遍指出，今日教會容易走向兩種極端：其一是過度強調知識與理論，使神學與教會生活脫節；其二則是過度強調經驗、活動與事工果效，卻忽略信仰根基與真理深度。此種張力，正與伊拉斯謨當年對教會外在化、形式化信仰之批判形成某種歷史性的呼應。

因此，當代教會若欲真正承接宗教改革與基督教人文主義之積極遺產，則不應僅停留於歷史紀念，而需進一步落實於實際教會生活之中。首先，教會需重新建立讀經與閱讀文化。受訪者不約而同提及，今日無論一般信徒，甚至部分牧者，都逐漸失去深入閱讀與長時間思考之能力。短影音、社群媒體與碎片化資訊雖提升資訊流通速度，卻也削弱人對真理持續沉澱與反思之能力。此現象不僅影響神學理解，更直接影響屬靈生命之深度。

教會應重新鼓勵查經、閱讀、神學學習與群體討論，使信徒重新建立對真理長期投入之習慣。閱讀不只是知識累積，更是信仰思維與屬靈眼界的塑造。伊拉斯謨之所以強調回到原典與聖經，並非單純學術興趣，而是盼望信徒真正透過理解神的話語而經歷生命更新。今日教會若缺乏閱讀文化，則信仰容易流於情緒化、口號化，甚至失去辨別能力。

教會需培養成熟之對話能力。在神學與公共議題上，信徒不應急於貼標籤或將對方視為敵人，而應學習理解不同立場之背景與論點，再進行理性回應。受訪者指出，當代教會在面對不同意見時，常陷入非黑即白之思維，缺乏耐心傾聽與理性討論。此種文化不僅削弱教會見證，也容易造成群體撕裂。伊拉斯謨所重視之節制、理性與和平對話，對今日教會仍具有重要提醒。此種態度並非放棄真理，而是以更合乎基督精神的方式持守真理。

¹⁰² 本研究訪談資料整理（未出版訪談記錄）。

此外，教會亦需重新重視門徒訓練。在消費文化影響下，教會容易逐漸淪為宗教服務提供者，使信徒成為宗教消費者。¹⁰³聚會人數、活動規模與事工成果，往往成為衡量教會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然而，宗教改革真正所強調者，乃是回到跟隨基督之門徒身份。因此，教會應幫助信徒在工作、家庭、公共生活與社會責任中活出福音，而不只是停留於聚會參與或宗教活動之中。

牧者與教會領袖亦需持續受裝備。訪談中有受訪者指出，今日部分教會領袖長期處於高壓牧養與行政事務之中，逐漸失去閱讀、反思與自我更新之空間。然而，歷史中的改革者皆重視閱讀、研究與內在生命更新。今日牧者若僅依靠過往經驗服事，而缺乏持續學習與神學反思，將難以回應快速變動之時代處境，也容易使牧養流於事工管理，而失去屬靈深度。

第六節 對華人教會處境的特別意義

在華人教會處境中，常同時出現兩種傾向：一方面偏重活動與實用性，忽略神學深度與信仰教育；另一方面則可能過度強調立場與界線，缺乏對話與彼此理解能力。此種現象，在本次訪談中亦被多位受訪者反覆提及。

部分受訪者指出，今日許多教會逐漸以「教會增長」作為最重要的衡量標準。聚會人數、事工規模、社群媒體影響力與活動成果，成為評估教會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在此氛圍之下，教會容易傾向以「事工效率」取代「生命深化」，以「活動熱度」取代「信仰更新」。然而，若教會長期缺乏神學教育、讀經文化與屬靈塑造，即使外在發展迅速，內在生命仍可能逐漸空洞化。

此種處境正反映伊拉斯謨當年對教會形式化與外在化之批判。他所強調的，不只是宗教制度改革，更是信徒內在生命之更新。換言之，真正的改革並非僅在於外在事工之擴張，而是回到聖經、回到基督，並使信仰真正進入人的思想、價值觀與生

¹⁰³ 本研究訪談資料整理（未出版訪談記錄）。

活之中。另一方面，華人文化本身高度重視和諧與關係，這雖有助於維持群體穩定，卻也可能影響對真理問題之判斷。受訪者指出，在部分教會文化中，為了避免衝突與維持表面和諧，真理問題有時被刻意淡化，甚至避免深入討論。牧者也容易陷入「維持氣氛」與「保護關係」之壓力中，而忽略真正需要面對之屬靈問題。

然而，此種表面的和諧並不一定帶來真正合一。當長期缺乏真誠對話與真理基礎時，群體內部的不滿與誤解反而可能逐漸累積，一旦衝突爆發，又容易迅速走向關係切割與彼此排斥。此種現象，正顯示華人教會在「真理」與「關係」之間，仍需要更成熟之平衡。

伊拉斯謨與路德之間的歷史張力，正可成為今日華人教會的重要提醒。伊拉斯謨提醒教會重視節制、教育與和平對話；路德則提醒教會，在關鍵真理問題上不能失去勇氣與立場。¹⁰⁴若教會只有和諧而沒有真理，則容易流於妥協；若只有立場而沒有恩典，則容易造成分裂與傷害。因此，華人教會真正需要的，不是選擇其中一方，而是在恩典與真理之間建立更成熟之屬靈生命。

第七節 結論：在張力中持守更新

綜觀本文，可見基督教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並非單純對立之關係，而是在衝突、互動與彼此影響之中，共同構成近代基督教更新的重要來源。伊拉斯謨提醒教會重視知識、教育、閱讀、節制與對話；路德則提醒教會持守恩典、福音、勇氣與真理。兩者雖在歷史中產生張力，卻同樣深刻影響後世教會之發展。

本研究透過訪談亦發現，今日無論牧會現場之牧者與傳道，或神學教育工作者，多數皆認同「學術、敬虔、牧養」三者之整合，乃教會健康發展不可缺少之基礎。此種共識，實際上正呼應伊拉斯謨所強調之核心精神：回到聖經、重視內在敬

¹⁰⁴ Massing, *Fatal Discord*, 530–548.

虔，並追求生命更新。真正成熟之信仰，並非僅停留於知識、情感或事工能力之單一層面，而是在真理、生命與實踐之間形成整全的屬靈生命。

今日教會面對重要危機之一，乃是閱讀文化與深度思考能力之流失。當教會逐漸被快速資訊、短影音文化與事工效率邏輯所影響時，信仰容易變得表面化與情緒化。若缺乏長期讀經、閱讀與神學反思，教會便難以建立成熟之辨別能力，也難以面對複雜時代中的挑戰。因此，重新建立讀經與閱讀文化，不只是教育問題，更是教會更新與屬靈重建的重要基礎。

另一方面，華人教會長期受關係文化與和諧導向影響，雖有助於群體穩定，卻也可能使教會過度追求表面和諧，而忽略真理判斷與誠實對話。相反地，在衝突發生時，又容易迅速走向彼此排斥與關係斷裂。這種現象顯示，今日教會仍需學習如何在恩典與真理之間建立成熟平衡。

因此，對當代教會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並非單純選擇站在伊拉斯謨或路德一方，而是在基督裡重新整合兩者之積極遺產。教會既需要真理，也需要謙卑；既需要恩典，也需要責任；既需要信念，也需要對話；既需要改革，也需要合一。

若教會只能在兩極之間不斷擺盪，歷史中的分裂與衝突便可能持續重演；然而，若教會能學習承載張力、在恩典中彼此對話，則歷史中的爭論反而可能成為今日更新之資源。真正成熟之教會，並非沒有張力之教會，而是在張力之中仍願意回到基督、回到聖經，並持續追求生命更新之教會。

本章最終結論乃是：當代教會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立場與口號，而是更成熟、更整全的神學生命；不只是外在事工之發展，而是內在屬靈生命之更新；不只是教會增長，更是信徒真正被福音塑造之生命。

第七章 結論

北方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神學之間：

橋樑、界線與歷史意義

本文透過對伊拉斯謨與馬丁路德之思想比較，試圖重新理解北方人文主義與早期新教神學之間既連續又斷裂的歷史關係。若從歷史發展的脈絡觀之，宗教改革並非憑空出現的神學革命，而是在中世紀晚期教會危機、文藝復興人文思潮興起、語言學與文本研究發展，以及社會政治結構轉變等多重因素交織之下逐漸形成。北方人文主義在其中扮演了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它一方面預備了宗教改革所需的思想土壤，另一方面卻又在若干核心神學議題上與宗教改革保持距離。因此，若要準確理解宗教改革的形成，便不能僅將其視為單一神學事件，而必須同時看見人文主義作為「橋樑」的功能，以及其作為「界線」的限制。¹⁰⁵北方人文主義承接義大利文藝復興所帶來的古典學術精神，但其關注焦點並非藝術美感或世俗政治，而是回到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更新。尤其伊拉斯謨所倡導之 *ad fontes*（回到源頭），強調回到希臘文新約、教父著作與原始基督信仰，對十六世紀神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在聖經研究方法上，伊拉斯謨於 1516 年出版《新約聖經校訂本》，提供希臘文新約文本與新的拉丁文譯本，不僅挑戰中世紀對《武加大譯本》的單一依賴，也開啟以原文重新理解聖經的可能。

宗教改革者，包括馬丁路德、慈運理與加爾文，皆大量受益於北方人文主義的成果。換言之，若無人文主義所帶來的語文復興與文本批判方法，宗教改革所強調的「唯獨聖經」便難以具體落實。與此同時，北方人文主義對教育、修辭學、歷史閱

¹⁰⁵ 麥格夫 (Alister E. McGrath)，《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香港：基道出版社，2006），45–63；約翰·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伊拉斯謨傳：伊拉斯謨與宗教改革》（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8），112–126。

讀與倫理實踐的重視，也深刻塑造了改革者的知識世界。它反對空洞繁瑣的經院哲學辯證，強調清晰、簡潔與回歸文本的學術態度，而這種精神亦與宗教改革批判晚期經院神學的方向高度一致。此外，伊拉斯謨對教士腐敗、修道制度流弊、迷信敬虔與形式主義信仰的批判，更使歐洲知識圈與城市階層逐漸形成改革意識。宗教改革之所以能迅速擴展，並非僅依靠少數神學家的力量，而是因為改革觀念早已在人文主義所塑造的文化氛圍中逐漸醞釀成熟。因此，北方人文主義確實成為早期新教神學的重要橋樑，它提供方法、語言、文本與改革意識，使宗教改革得以在思想與社會層面逐步成形。

然而，若僅將北方人文主義理解為宗教改革的前奏，則仍過於簡化兩者之間的複雜關係。當討論進入恩典、自由意志、罪性與救恩等核心神學議題時，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便顯露出深刻且難以消除的界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伊拉斯謨與馬丁路德圍繞自由意志所展開的論戰。伊拉斯謨在《論自由意志》中主張，人雖受罪影響，仍保有某種回應神恩典的能力，神的恩典與人的意志可以形成合作關係；此種立場反映出其人文主義思想對理性、人性尊嚴與道德責任的基本信任。相對地，馬丁路德在《論意志的捆綁》中則主張，墮落之後的人意志已被罪完全奴役，人無法主動轉向上帝，唯有神主權性的恩典才能使人得救。對馬丁路德而言，若人在救恩上仍有任何可誇之處，福音便失去其純粹性。¹⁰⁶因此，雙方爭論的核心並不只是自由意志本身，而是對人性的根本理解不同，人究竟是可透過教育與德行被改善的存在，或是徹底需要神恩典拯救的罪人？此種差異亦反映出人文主義改革與宗教改革神學之間本質性的不同。伊拉斯謨較傾向透過教育、倫理與文化更新來改善教會與社會，對人的潛能仍保有一定信心；馬丁路德則強調因信稱義、十架救恩與神恩典的絕對性，更深刻地指出人的無能與罪的敗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改革神學雖在罪論上對人性提出尖銳批判，卻並未拒絕人文主義的學術成果，反而廣泛承接並轉化之。馬丁路

¹⁰⁶ Clarence H. Miller, ed., *The Battle over Free Will*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2012), xiii–xxii ; E. Gordon Rupp, ed., *Luther and Erasmus: Free Will and Salvation*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58–201。

德雖批判理性不能帶來救恩，卻極重視語言教育與聖經翻譯，其德文聖經對德語發展影響深遠；加爾文則展現高度人文教育背景，其《基督教要義》不論在結構安排、修辭表達或論證方式上，皆深受古典人文教育影響。此外，宗教改革者普遍採納歷史文法解經法，強調經文原意、上下文與原文語義，而這些方法承襲人文主義的文本研究傳統。由此可見，宗教改革並非全然拒絕人文主義，而是在神學立場上修正人觀，並在方法論上吸納成果。這也形成一種深具歷史意義的弔詭，改革者越強調人的敗壞，便越需要嚴謹的學術工具來準確傳講神的話語；人的理性雖不能成為救恩根據，卻仍可被神使用來服事真理。

綜合而言，北方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的關係，既非單純延續，也非全面對立，而是一種充滿張力的歷史互動。人文主義提供宗教改革必要的文化語境、文本工具與改革意識；宗教改革則突破人文主義對理性與人性相對樂觀的理解，重新將焦點置於恩典、十架與福音核心。與此同時，宗教改革也不能僅被理解為對中世紀教會制度的反動。誠然，中世紀晚期教會確已出現嚴重危機，包括贖罪券濫用、教廷財政壓迫、主教兼職、教士道德敗壞，以及形式化宗教生活所帶來的信仰空洞化，這些問題皆促使改革呼聲日益高漲。然而，若缺乏十五、十六世紀歐洲文化轉型所提供的歷史條件，改革難以形成廣泛且深遠的運動。印刷術的發明，使聖經、講章與小冊子得以迅速流通；民族語言的興起，使德文、英文與法文譯本成為可能；城市中產階級與新興大學文化，提供改革思想的接受者與推動者；地方君侯與民族政治意識的興起，則逐漸削弱教廷的絕對權威。換言之，宗教改革既是神學事件，也是文化事件、語文事件與政治事件，更是中世紀秩序瓦解與近代世界興起之交界點上的歷史轉向。因此，北方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之間的相遇與張力，不僅構成十六世紀歐洲思想轉型的重要關鍵，也對今日教會具有持續性的提醒與啟示。

此外，本研究透過對牧者、傳道與神學教育工作者之訪談，也進一步發現：無論在牧會現場或神學教育領域中，多數受訪者皆認同「學術、敬虔與牧養」三者之平衡，乃今日教會不可忽略的重要課題。若教會僅強調知識，容易使神學與生命脫

節；若僅重視事工與經驗，又可能使信仰逐漸失去深度與根基。此種反思，實際上正呼應伊拉斯謨所強調之核心精神：回到聖經、重視內在敬虔，並追求生命更新。真正成熟之信仰，並非停留於外在宗教活動，而是在真理、生命與實踐之間形成整全的屬靈生命。

訪談中亦反覆提及，當代教會正面臨閱讀文化與深度思考能力逐漸流失之危機。在短影音、碎片化資訊與快速媒體文化影響之下，信徒甚至部分牧者，也逐漸失去長時間閱讀、默想與深入理解信仰之能力。然而，無論是北方人文主義所強調之文本閱讀與教育精神，或宗教改革所強調之「唯獨聖經」，皆建立於對神話語長期且深入之理解。因此，今日教會若欲真正走向更新，便不能忽略讀經、閱讀與神學反思的重要性。¹⁰⁷重新建立閱讀文化，不只是教育問題，更是教會屬靈生命重建的重要基礎。

真正的教會更新，既需要知識、教育、語言與文化層面的更新，使信仰得以被清楚理解與真實傳達；也需要屬靈上的悔改與對恩典的重新回歸，使人不再倚靠自身能力，而重新回到福音核心。若只有前者，教會可能淪為文化機構；若只有後者而輕忽思想與教育，信仰又可能流於狹隘與反智。北方人文主義確實成為宗教改革的重要橋樑；然而，它終究不是宗教改革本身的終點。它為改革預備語言、方法與文化條件，卻未真正進入宗教改革關於恩典、罪與救恩的神學核心。因此，如何在學術與信仰、理性與啟示、改革與傳承之間，尋求一條既忠於福音、又能回應時代處境的道路，仍是當代教會持續面對的重要課題。這也正是本文研究最終欲指出之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所在。

¹⁰⁷ 斯托得 (John R. W. Stott)，《心意更新的教會》(新北市：校園書房，2012)，83-97；林鴻信，《系統神學(上、下冊)》(新北市：校園書房，2017)，522-531。

筆者以加爾文的禱告來致謝及感恩。

「願主使我們得以默想祂屬天智慧的奧秘，在敬虔中真實長進，使

主的名得著榮耀，也使我們得蒙造就。」

— 加爾文

“May the Lord grant that we may engage in contemplation of the heavenly mysteries of His wisdom, with true progress in godliness, to the glory of His name and for our edification.”

— John Calvin

附錄一 訪談目的與訪談架構說明

本研究之主題為《伊拉斯謨的北方人文主義及其對宗教改革早期神學取向的影響》，除了透過文獻分析探討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的人文主義思想與宗教改革初期神學之間的關聯外，也嘗試進一步思考其思想對當代華人教會與神學教育之啟發。因此，本研究採取「文獻研究」與「半結構式訪談」並行之方式，以增加研究之實踐向度與當代對話性。

本次訪談之主要目的，在於了解今日教會與神學院如何面對「學術（Academic）」、「敬虔（Piety）」與「牧養（Pastoral Ministry）」三者之間的張力與整合問題。研究者觀察到，當代教會與神學教育常出現以下幾種失衡現象：過度強調知識訓練而忽略靈命塑造、偏重經驗與事工而缺乏神學深度、或具有神學知識卻缺少實際牧養能力。此現象與宗教改革前晚期中世紀教會之問題，在某些層面上具有相似性，而伊拉斯謨所強調之「回到聖經」、「內在敬虔」與「生命更新」，亦可能成為今日教會的重要反思方向。

因此，本研究透過訪談，嘗試了解：

- ✓ 今日教會與神學院如何理解神學教育的目的；
- ✓ 當代牧者與神學教育工作者如何看待學術、敬虔與牧養之間的關係；
- ✓ 當代教會在實際牧養與屬靈塑造上所面臨的困境；
- ✓ 伊拉斯謨的人文主義精神對今日教會是否仍具參考價值。

在訪談架構方面，本研究共訪談五位受訪者，包括教會牧者與神學院教師兩大類：

（一）教會牧者與同工（共三位）

包括：教會牧師一位；教會傳道人兩位。

受訪對象涵蓋不同教會背景與牧養經驗，盼望藉此了解不同教會型態對神學教育、靈命塑造與牧養實踐之看法。

（二）神學院教師（共兩位）

包括：神學院助理教授兩位。

受訪者皆具備神學教育與教會服事經驗，能從神學研究、教育訓練與教會實踐等層面，提供對當代神學教育之觀察與反思。

本研究之訪談採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式進行。此方法一方面保留核心問題，使不同受訪者能圍繞共同主題進行討論；另一方面，也保留開放性與延伸空間，使受訪者能根據自身經驗與處境提出深入觀察。研究者盼望透過此方式，不僅蒐集理論性觀點，也能呈現教會與神學教育現場中的真實處境與張力。

附錄二：訪談題目設計與論述

本研究之訪談題目，主要圍繞「學術（Academic）」、「敬虔（Piety）」與「牧養（Pastoral Ministry）」三大面向進行設計，並最終回到三者整合之議題。此架構不僅呼應伊拉斯謨神學思想之核心，也對應當代教會與神學教育常見之失衡現象。

伊拉斯謨認為，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應僅停留於外在制度或知識辯論，而應回歸聖經、重視內在生命更新，並落實於實際生活之中。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訪談，了解今日教會與神學院是否仍面對類似問題，以及當代牧者與神學教育工作者如何回應。

一、學術（Academic）

此部分問題主要探討當代教會與神學院對神學教育之理解與定位。

訪談題目包括：

您認為今日教會／神學院對神學教育的重視程度如何？

您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太重知識？太重經驗？太重事工？為什麼？

神學知識是否真正影響信徒生命與教會牧養？請舉例說明。

此部分之設計，主要在於了解今日神學教育是否仍具有屬靈塑造與牧養實踐之功能，或已逐漸偏向純學術化。研究者亦希望透過受訪者之觀察，分析當代教會是否存在「知識與生命分離」之現象。

二、敬虔 (Piety)

伊拉斯謨十分重視內在敬虔 (Inner Piety) 與基督徒生命更新，因此本部分聚焦於屬靈生命與神學教育之關係。

訪談題目包括：

您認為今日教會／神學院如何培養敬虔生活？

「知識增加，但靈命未成熟」這種現象是否存在？

您認為屬靈操練（禱告、默想、靈修）與神學研究之間，應如何平衡？

本部分希望探討，當代教會與神學院是否真正重視靈命塑造，以及神學研究是否可能與敬虔生活產生張力。研究者亦期待透過訪談，了解受訪者如何看待「神學」與「靈修」之整合問題。

三、牧養 (Pastoral Ministry)

本部分主要關注神學教育與實際牧養現場之間的連結。

訪談題目包括：

今日教會最大的牧養困境是什麼？

神學教育是否足以裝備牧者面對真實牧養需要？

您認為今日牧者最缺乏的是：神學深度、靈命成熟、牧養能力，或人際與情緒能力？為什麼？

此部分之設計，在於了解當代牧者於實際服事中所面對之挑戰，以及神學教育是否能有效回應教會現場之需要。研究者亦希望藉此分析，今日牧養困境是否與神學教育之失衡有關。

四、整合（Integration）

最後，本研究將焦點回到「學術、敬虔與牧養」三者之整合問題。

訪談題目包括：

您認為「學術、敬虔、牧養」三者之間，目前最大的失衡在哪裡？

若以一句話形容理想的神學教育／教會牧養，您會怎麼說？

您認為伊拉斯謨強調的「回到聖經、內在敬虔、生命更新」，對今日教會仍有意義嗎？為什麼？

此部分為整份訪談之核心總結。研究者希望透過受訪者之反思，進一步分析伊拉斯謨思想在當代教會與神學教育中的實踐可能性，並作為本研究結論之重要參考依據。

附錄三：訪談人物及訪談日期

張旂 牧師 台北市北投區道生錫安教會

5/14 /2026 電話訪談

林耀彪 傳道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崗教會

5/14/2026 電話訪談

王英州 傳道 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士林真理堂

5/15/2026 現場訪談

王榮耀 助理教授 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

5/15/2026 電話訪談

張廷玉 助理教授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5/16/2026 電話訪談

附錄四：訪談摘要

北投區牧者訪談摘要

本次訪談對象為北投區一間小型社區教會之牧者，內容主要圍繞神學教育、敬虔生活、牧養實況，以及當代牧者面對的挑戰與整合觀點。

一、學術與神學教育

受訪牧者肯定神學教育的重要性，認為神學知識能幫助信徒正確認識真理，並成為生命建造的基礎。然而，他也特別強調，神學若僅停留在知識層面的讀經、查經或課程學習，而未真正進入生命實踐，就容易失去神學教育原本的目的與價值。

牧者提到，他所牧養的是一間小型教會，因教會長期面對發展與擴展壓力，容易將重心偏向事工運作與教會增長。然而，這也逐漸成為教會的一項隱憂：當事工多於生命塑造時，信仰容易流於忙碌與功能導向。因此，他認為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事奉與教會事工中真正活出屬靈生命。

他再次強調，神學知識本身並非問題，真正重要的是，信徒是否能藉由真理的認識，被帶向生命的更新與成熟。

二、敬虔生活與屬靈操練

在敬虔生活方面，受訪牧者認為，信徒的屬靈生命仍需回到最基本的操練，包括讀經、禱告與穩定參與聚會。這些看似基礎的屬靈習慣，實際上是建立敬虔生命的重要根基。

然而，他也觀察到，今日教會需要更加留意信徒實際參與與投入的狀況，而不只是形式上的聚會出席。

對於知識與屬靈成長之間的關係，牧者坦言：「知識的確容易帶來驕傲。」他認為這是教會中相當普遍的現象。有些信徒僅接受部分訓練或裝備課程後，便急於教導他人，卻忽略了生命尚未成熟。

因此，他指出，不論是屬靈操練、神學研究，或各類教會裝備，其核心目的都不應只是增加知識，而是幫助人「活得更像基督」。這也是衡量屬靈成長最重要的標準。

三、牧養現況與教會困境

談到牧養實況時，牧者提到教會目前最大的困境之一，是缺乏穩定同工。由於教會規模較小，且屬於地方性的社區教會，信徒與家庭普遍面對各種現實生活壓力，包括家庭、工作、經濟與人際等問題。

因此，牧會工作往往需要投入大量陪伴與關懷，但小型教會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牧者與同工都承受相當大的壓力。

牧者也提到，教會中需要更多彼此體諒與支持的氛圍。無論是牧者、同工或信徒，都需要在有限資源與現實壓力中，學習彼此理解與扶持。

四、當代牧者的缺乏與挑戰

針對今日教會與牧者的處境，受訪牧者提出不同層面的觀察。

他認為，大型教會的缺乏，往往在於牧養深度與人際關係的疏離。雖然制度、資源與事工完整，但牧者與信徒之間容易缺少真正的陪伴與生命連結。

相對而言，小型教會則較容易缺乏神學深度與完整裝備。由於人力與資源有限，牧者常需兼顧大量行政與實務工作，而難以持續投入神學研究與深化。

此外，他也指出，受到社會快速變遷與生活節奏影響，今日許多牧者逐漸失去「陪伴人的能力」。在忙碌與壓力之下，牧會容易變成問題處理與事工管理，而忽略了真正與人同行的重要性。

五、學術、敬虔與牧養的整合

最後，受訪牧者強調，學術、敬虔與牧養三者之間不可被分割。

他認為，若牧者只專注於教導、講道或學術研究，而缺少實際牧養與生命陪伴，牧會工作便容易失去溫度。

真正的牧者，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應效法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樣，進入人的生命處境中，與人同行。

因此，他認為真正成熟的牧養，是將真理、生命與關懷整合在一起，使神學不只是停留在課堂或書本中，而是真正活在人與教會群體之中。

南投南崗長老教會傳道訪談整理

本次訪談對象為南投 南崗長老教會 傳道，內容主要圍繞神學教育、敬虔生活、牧養現場，以及神學、生命與教會實踐之間的整合關係。受訪者從實際牧會經驗出發，分享其對當代教會處境與牧者角色的觀察與反思。

一、神學教育的重要性：從知識到生命

受訪傳道認為，今日教會必須重新重視神學教育的重要性。因為對聖經的認識，其實就是對上帝的認識，而神學教育也會直接影響信徒的信仰實踐與教會生活。

然而，他也坦言，現代教會容易陷入「事工導向」的問題。教會若過度強調活動、聚會與服事成果，雖然短時間內可能帶來熱鬧與成長，卻不一定能真正建立信徒生命。有時甚至容易演變成一種以「行為換取恩典」的信仰觀，使人將服事變成證明自己屬靈價值的方式。因此，他認為教會需要透過講道、團契與成人主日學等方式，將神學帶入教會生活中。透過不同神學觀點與論述的分享，幫助信徒更全面地認識上帝，而不只是停留在單一、片面的理解。

對他而言，真正的神學教育，不只是知識累積，而是幫助人從真理進入生命更新。

二、敬虔生活：從「聽見」到「活出」

在敬虔生活方面，受訪傳道表示，其教會以改革宗傳統作為主要信仰根基，特別重視「五個唯獨」的信仰精神（唯獨聖經、唯獨信心、唯獨恩典、唯獨基督、唯獨榮耀上帝），藉此幫助信徒建立正確的信仰基礎與敬虔生活。

對於「知識增加，但靈命未成熟」的現象，他認為這是教會中普遍存在的情況。然而，他指出，從「聽見真理」到真正活出信仰，本來就是一段漫長的生命轉化過程。

因此，神學不能停留在頭腦理解，而需要進入日常生活的實踐。信徒需要在現實生活中學習順服、操練與活出基督的樣式。

由於一般信徒較難深入進行神學研究，因此牧者便需要透過講台、成人主日學與團契分享，引導信徒將神學與生活連結。同時，他也特別強調默想與禱告的重要性。透過屬靈操練，信徒能逐漸學習從「神的視角」來看待世界與人生，而不只是停留在人本與現實層面。

此外，他提出一個重要觀點：神學不只是個人的神學，也是在群體中做神學。信徒需要在教會群體中彼此學習、彼此修正，共同尋求如何在時代中活出信仰。

三、牧養現場的困境與挑戰

談到牧養處境時，受訪傳道認為，當代社會深受個人主義、效率導向與消費主義影響，這些價值觀也逐漸進入教會之中。

許多信徒容易以消費者心態參與教會，追求快速、便利與立即性的滿足，而缺乏長期委身與生命深度，形成一種「淺碟文化」的信仰現象。

在這樣的環境下，他認為神學教育與神學院的裝備顯得更加重要。因為真正的神學訓練，不只是增加知識，而是幫助牧者以更謙卑的態度，深入理解信仰與人的生命處境，而非只停留在表面的事工運作。

他也再次提到「道成肉身」的重要性。牧者不能只是站在講台上教導，更需要在群體中活出基督的樣式，真正進入人的生命處境，陪伴人的軟弱與痛苦。

至於今日牧者最缺乏的部分，他認為不是單純的神學知識，而是「人際關係能力」與「情緒管理能力」。

牧者需要學習建立信任關係，也必須懂得面對與控制自己的情緒。他提到，有些牧者因長期無法承受情緒壓力，最終離開牧會現場。這也反映出，牧會不只是知識與能力的問題，更是一種人格與生命成熟度的考驗。

四、神學、敬虔與牧養的整合

在訪談最後，受訪傳道強調，神學、敬虔與牧養三者之間不可分割。唯有整全地認識上帝，人才可能真正進入敬虔生活與健康牧養。

他認為，基督信仰不只是教義、口號或宗教活動，而是真實活出的彼此相愛。因此，神學的本質其實是「愛的教育」，而教會則應成為「愛的體現」。神學教育最終仍必須回到真正認識上帝這件事上。當人內在產生真正的敬虔時，生命便會帶來外在的更新與改變。真正的神學，不只是頭腦的理解，而是生命的轉化。

最後，他也提醒，基督信仰並非短時間即可完成，而是一條漫長的信仰道路。信徒需要在群體、生活與歲月中，持續學習如何跟隨基督、認識上帝，並活出信仰。

受訪者：中華福音信義會真理堂 傳道

受訪者認為，當代教會與神學教育正面臨一種深層的矛盾現象：教會表面上重視神學教育，但真正願意投入時間深入聖經、歷史與神學反思的人卻不多。在當代教會文化中，往往更重視聚會人數、事工效率、領袖魅力，以及聚會是否「有感」，然而神學卻需要長時間閱讀、深度思辨與面對複雜性的能力。這些特質與現代快速、即時的文化氛圍形成張力。因此，他認為今日最大的問題並非「沒有神學」，而是神學逐漸被邊緣化，只被視為一種專業知識，而非教會生命真正的根基。

在談到今日華人教會最大的失衡時，受訪者指出，目前教會普遍存在「事工導向凌駕神學與靈命」的現象。許多牧者與同工雖然十分忙碌，卻未必真正成熟。教會可能擅長活動帶領、行政管理與聚會經營，但不一定真正理解聖經整體脈絡、教會歷史、人性的複雜，以及十字架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教會過度強調屬靈感動與

個人經驗，卻缺乏神學上的辨識能力，導致信仰容易變得情緒化、片段化，甚至流於跟隨潮流。他認為問題並非偏重某一面向，而是學術、敬虔與牧養三者失去了整合。

關於神學知識是否真正影響信徒生命與教會牧養，受訪者表示，神學對信仰生命的影響其實非常深遠。若一個人對神的理解僅停留在成功、祝福與問題解決，那麼當他面對苦難、失敗、沉默與死亡時，信仰便很容易崩塌。然而，若神學能幫助人重新理解十字架、苦難中的同在、聖約、盼望與神國，那麼信仰便不只是情緒支持，而會成為生命真正的根基。他也提到自己在以色列的經驗，使他更加深刻地體會到，聖經並非抽象概念，而是真實歷史中的救贖故事；當人重新進入聖經世界觀時，信仰也會因此變得更加立體。

在敬虔生活方面，受訪者認為，今日教會最大的問題是「很會教服事，卻不一定很會教與神同在」。許多神學生與教會同工長期處於忙碌與疲憊之中，雖然充滿責任感，但內在生命卻可能十分乾渴。因此，他認為敬虔並不是增加更多宗教活動，而是重新學習安靜、禱告、默想、等候，以及在神面前誠實。這也是他後來特別重視禱告殿與敬拜生活的原因。

對於「知識增加，但靈命未成熟」的現象，受訪者坦言這種情況在今日教會中非常普遍。有時神學知識會使人更善於辯論、分析與批判，卻未必更像基督。他強調，真正成熟的神學應當帶來謙卑、悔改、愛人，以及對真理的敬畏；若知識沒有真正進入生命，它反而可能成為另一種宗教性的自我保護。

至於屬靈操練與神學研究之間的關係，受訪者認為兩者原本就不應分離。在教會歷史中，許多偉大的神學家同時也是深刻禱告的人，例如 Augustine、Martin Luther 與 John Calvin。他指出，神學不只是研究神的知識，更是在人生命中回應神。因此，禱告使神學不致冰冷，而神學則使禱告不至失去方向。

在牧養層面，受訪者認為今日教會最大的困境在於：人的內在破碎越來越深，但教會的陪伴能力卻未必跟得上。現代人普遍面對焦慮、孤獨、家庭創傷、身份混亂與網路時代的碎片化問題，但教會有時仍只提供標準答案、道德要求，或快速屬靈化

的回應。他認為真正的牧養需要陪伴、傾聽、分辨與忍耐，甚至願意陪伴一個人走過一段漫長的生命道路。

談到神學教育是否足以裝備牧者面對真實牧養需求時，他認為目前仍然不足。因為許多神學教育依然偏重課堂、理論與論文研究，但牧養現場實際面對的，卻包括婚姻問題、精神疾病、權力衝突、情緒創傷、教會政治，以及領袖孤獨等議題。這些問題並非僅靠系統神學即可解決。因此，他認為神學教育需要更加重視靈命塑造、情緒成熟、督導制度，以及真實牧養現場的參與。

對於今日牧者最缺乏的部分，受訪者認為是「整合後的成熟」。他指出，許多人可能擁有神學知識，卻缺乏愛；擁有熱情，卻缺乏深度；擁有能力，卻缺乏內在生命；擁有異象，卻沒有處理自身的傷口。因此，他認為今日牧者需要學習面對自己、建立真實人格、培養情緒成熟，並真正活出福音，而不只是傳講福音。

最後，在談到「學術、敬虔、牧養」三者最大的失衡時，受訪者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三者已被彼此拆開：學術逐漸學院化，敬虔變成個人靈修，而牧養則淪為事工管理。然而在初代教會與宗教改革傳統中，神學、禱告與牧養原本就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面向。因此，他認為理想的神學教育與教會牧養，應當是「讓真理進入生命，讓生命活出真理」，不只是培養會講道的人，而是培養真正像基督的人。

在回應 Desiderius Erasmus 所強調的「回到聖經、內在敬虔與生命更新」時，受訪者認為這對今日教會仍然極具意義。他指出，今日教會最大的危險之一，是外在宗教形式愈來愈多，但內在生命卻可能愈來愈空洞。伊拉斯謨提醒教會，真正的更新不是先從制度開始，而是從人的內在開始；而「回到聖經」也不只是回到字句本身，而是重新回到基督、福音、悔改、愛，以及真實的生命更新。

受訪者最後以一段屬靈反思作為結語。他認為，真正的靈性成長並不是不斷向外尋找新的方法、經驗或刺激，而是需要人願意放慢腳步，在安靜中重新學習耶穌基督的禱告生活。他指出，人若缺少安靜，便很難真正聆聽神的聲音；而對聖經的認

識，也不只是停留在知識理解，更需要聖靈的啟示，才能真正進入聖經文本所呈現的屬靈世界與救贖視野。

他進一步表示，當人越來越清楚神的國與神的義，生命便會自然流露出敬拜與敬虔的生活。敬虔並非外在形式的堆疊，而是內在生命因著與神同行而逐漸被塑造。他認為，真正成熟的信仰，乃是在人有限與短暫的世界中，學習將眼光轉向永恆，看重那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屬靈實際。

因此，他以《聖經》哥林多後書 4 章 18 節作為總結：「因為我們不是顧念看得見的，而是顧念看不見的；原來看得見的是暫時的，看不見的才是永遠的。」他認為，這節經文正提醒今日教會與信徒，在繁忙、快速與功利導向的時代中，仍需重新回到神面前，在安靜、敬拜與真理中，學習活出真正以神國為中心的生命。

訪談紀錄整理

神學教育中的「學術、敬虔、牧養」整合（華神助理教授）

一、學術神學教育的意義

受訪者強調神學教育在整體教會中的根基性角色，特別是在道學碩士（M.Div.）課程層級，更應具備一定的學術要求，因為這些受訓者將來多半成為教會牧者。

他指出當前教會與神學教育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對「真理教導」的不夠重視，反而過度強調「事工導向」，例如教會的經營與擴張。

在他看來，神學知識並非抽象理論，而是直接影響信徒生命與信仰成熟的關鍵。真正的信徒在某種程度上必然需要認識聖經與神學，而神學教育能夠幫助信徒建立穩固信仰基礎；相反地，錯誤或偏差的神學理解，則可能阻礙信仰成長。

二、敬虔與靈命培育

在靈命塑造方面，神學院透過多元方式培養學生的敬虔生活，包括崇拜、禱告會以及靈修小組（mentor 制度）等。

受訪者認為，「知識增加但靈命未成熟」的現象並不常見，因為正確的神學知識本身就具有引導信仰深化與靈命成長的功能。也就是說，知識與靈命並非對立，而是可以互相建造的。

三、牧養與教會現況

談及當代教會的牧養困境時，受訪者首先提醒，必須先界定「理想的教會」是什麼，才能正確評估所謂的困境。

他舉例指出，許多人理想中的教會往往偏向「都會型、中上階層、穩定會眾」的模式，但若教會人數固定（穩定聚會），是否就必然構成牧養困境，值得進一步思考。他提出一個重要張力：教會在「廣度（人數增長）」與「深度（信徒穩定與成熟）」之間的平衡問題。

此外，他認為神學教育的功能之一，是提供「釣竿」而非單純的「魚」，強調牧者需要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

在牧者角色方面，他傾向認為牧者應具備「通才型」特質，雖然這樣的角色仍可能存在不足之處，但對於現代教會具有其必要性。

四、神學與牧養的整合反思

在整體整合層面，受訪者認為當代教會最大的失衡在於「真理的不足」。

具體表現包括：講道者未能深入聖經文本發掘新的理解，也常見講道內容未能有效與生活處境結合。他進一步指出，相較於 Erasmus 研究所強調的神學與人文整合精神，台灣教會信徒普遍較不重視神學知識，甚至出現某種「反智傾向」。

同時，他也觀察到信徒較缺乏真正內化後的生命更新，反而更容易聚焦在教會的外在擴張與「宗教組織的經營」，而非信仰本質的深化。

一、學術：神學教育作為牧養根基

受訪者指出，今日教會整體而言，對神學教育的重視程度相對不足；相較之下，神學院仍持續透過大量的學術訓練，培育未來的牧者與神學工作者。她認為，當前教會普遍偏重「經驗」與「事工成果」，而學校則較強調「知識建構」。雖然兩者似乎形成張力，但若缺乏穩固的知識累積，整體信仰與牧養都會變得不穩固。

她強調，神學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知識傳遞，更是在培養能長期承擔教會使命的神學工人。因此，紮實的神學基礎是不可忽略的。神學教育固然會影響信徒的生活與教會發展，但更重要的是，神學必須先深化成為牧者與信徒生命中的「DNA」，才能真正成為牧養與服事的基礎。

此外，她特別提到，今日許多牧者最大的缺乏之一，是「不愛讀書」。她認為，神學深度是「不進則退」的；人際能力、情緒能力與牧養技巧都可以透過經驗逐漸累積，但若失去神學的積澱與反思，整體牧養最終仍會動搖。

二、敬虔：信仰的內化與靈命成熟

在敬虔生活方面，受訪者認為，今日教會面對的困難比過去更加複雜。由於世界快速變動、資訊與誘惑大量增加，信徒要培養穩定而深層的敬虔生活並不容易。

然而，她指出，神學院其實比教會更清楚如何培養敬虔生活。因為真正的敬虔，不只是外在宗教行為，而是一種信仰的「內化」。牧者與神學教育可以引導信徒走向敬虔，但最終，生命的更新仍是聖靈的工作。

她也提醒，「知識增加，靈命卻未成熟」是一種危險的警訊。真正的靈命成熟，需要長時間的破碎、淬煉與等候，而非單靠知識堆積即可形成。因此，在從事神學研究之前，人必須先與上帝建立真實的連結。唯有與神連結，才能真正明白神的話語，也才能避免神學研究淪為純粹知識化的工作。

三、牧養：在複雜時代中的牧者角色

談到牧養，受訪者認為，今日教會最大的挑戰在於「人變得更加複雜」。現代人不再像過去那樣容易敞開自己，人的情感、處境與關係模式也越來越多變。因此，牧養方式不再是單一旦固定的，而是充滿變化與不規則性。

她特別提到，牧者本身其實也需要被牧養。當牧者面對混亂、迷失或疲憊時，需要重新回到神學的根基，也就是回到上帝的話語之中。她認為，神學教育的重要性，正在於它能幫助牧者在複雜處境中重新確認自己的方向。

此外，她指出，牧養能力固然能透過經驗累積，但若缺乏神學基礎，牧養就容易失去中心。因此，神學並非脫離教會現場的學問，而是牧養實踐的重要支撐。

四、整合：學術、敬虔與牧養的平衡

對於「學術、敬虔、牧養」三者之間的關係，受訪者認為，目前最大的失衡點其實是「敬虔」。她指出，現代人長期處於破碎與忙亂之中，以致於難以進入真正的敬虔生活。她認為，神學教育與教會牧養並非彼此分離，而是彼此影響、彼此牽動的關係。神學教育能深化教會的牧養；而教會的實際需要，也會推動神學教育不斷調整與反思。

此外，她以 Erasmus 的思想作為一種整合性的典範。Erasmus 所強調的「回到聖經、內在敬虔、生命更新」，正是一種「學術、敬虔、牧養」的整合。唯有真正明白上帝的話語，人才能產生內在的敬虔；而內在的敬虔，最終將帶出生命的更新與改變。

最後，她提到，「經歷上帝」其實存在於信徒每天的生活之中，可能是一段經文、一句話，或一件事情。若人無法與上帝建立真實連結，也將難以真正與人連結。因此，信仰最終不只是知識或事工，而是一種持續與上帝同行的生命狀態。

參考書目

林鴻信著。《系統神學 上、下冊》。新北市：校園書房，2017。

林鴻信著。《基督宗教與東亞儒學的對話：以信仰與道德的分際為中心》。台北市：台灣大學出版社，2009。

傅佩榮著。《西方哲學之旅上、中、下冊》。台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22。

蔡美麗著。《現代西洋哲學史上、中、下冊》。新北市：聯經出版社，2023。

謝大立著。《揚聲高唱咱的歌：口述歷史與教會史研究初探》。台北市：台灣神學院，2013。

亞瑟·伯格（Arthur Asa Berger）著。《媒介與傳播研究方法》。黃光玉、劉念夏、陳清文譯。台北市：風雲論壇，2004。

保羅·湯普遜著《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覃方明等譯。台北市：牛津，1999。

陶理主編。《基督教二千年史》（*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李伯明、林牧野譯。香港：海天書樓，2004。

理查·哈里斯、亨利·梅爾-哈亭（Richard Harries）（Henry Mayr-Harting）著《基督宗教簡明史》（*Christianity: two thousands years*），晴天譯。台北市：城邦出版社，2006。

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著。《歷史神學》（*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趙崇明譯。香港：天道書樓，2020。

凱利（J.N.D. Kelly）著。《早期基督教教義》（*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康來昌譯。新北市：中華福音，2010。

斯托得（John R.W. Stott）著。《心意更新的教會》（*The Living Church*）。譚達峰譯。新北市：校園書房，2012。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著。《加爾文基督教要義 上、下冊》（*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翻譯小組 譯。台北市：加爾文出版社，2011。

麥格夫（Alister E. McGrath）著。《宗教改格運動思潮》（*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蔡錦圖、陳佐人譯。香港：基道出版社，2006。

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著。《伊拉斯謨傳：伊拉斯謨與宗教改革》（*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何道寬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8。

伊拉斯謨（Erasmus D.）著。《論基督君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李康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2003。

雅各·布各哈克（Jacob Burckhardt）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an: Ein Versuch*）。花亦芬譯。新北市：聯經出版社，2007。

Bavinck, Herman 《改革宗教義學》（*Our Reasonable Faith*）。趙中輝譯。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22。

Fitzroy, Charles 著。《文明的驛站》（*Florence: In The Great Cities in History*），Edited by John Julius Norwich. 張毅瑄譯。新北市：聯經，2020。

Adams, Robert M., ed. *The Praise of Folly and Other Writings: Desiderius Erasmu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9.

Bavinck, Herman. *Our Reasonable Faith*. Translated by 趙中輝. Taipei: Reformed Publishing House, 2022.

De Gruchy, John W. *John Calvin: Christian Humanist & Evangelical Reformer*. Oregon: Cascade Books, 2009.

- D'Aubigné, J. H. Merl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7.
- Dolan, John P., ed. *The Essential Erasmu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
- Huizinga, Johan. *Erasmus and the Age of Reformatio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18.
- Huizinga, Johan. *Men and Ideas: History, the Middle Ages, the Renaiss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Kristeller, Paul Oskar. *Renaissance Thought: The Classic, Scholastic and Humanist Strai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 McGrath, Alister E.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2.
- McGrath, Alister E.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1998.
- McGrath, Alister E. *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21.
- Massing, Michael. *Fatal Discord: Erasmus, Luther, and the Fight for the Western Min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8.
- Miller, Clarence H., ed. *The Battle over Free Will*.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12.
- Olin, John C., ed. *Christian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Erasmu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 Pabel, Hilmar M., ed. *Erasmus' Vision of the Church*.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lantinga, Alvin.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ummel, Erika. *Erasmus*.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Rupp, E. Gordon, ed. *Luther and Erasmus: Free Will and Salva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9.